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论柳宗元治柳的政治革新思想流变

科目编码：ULSZ 3078

学生姓名：林巧贝

学位名词：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余曆雄 师

呈交日期：2013 年 11 月 15 日

本论文为获得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谢	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1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3
第三节 论文构思	6
第二章 柳宗元的仕途分期与政治革新思想的发展	9
第一节 柳宗元贬谪前后的仕途分期	9
第一类 长安任期(798-805)	10
第二类 永州贬谪期(805-815)	13
第三类 柳州任期(815-819)	17
第二节 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之启蒙与延续	20
第三章 柳宗元治柳州的挑战与政绩	29
第一节 治柳之难	29
第二节 治柳之效	36
第四章 柳州革新与“顺宗新政”之政治思想流变	44
第一节 柳宗元“顺宗新政”的政略要旨	44
第二节 治柳与“顺宗新政”的异同与流变	49
第五章 结语	59
参考书目	63

论柳宗元治柳的政治革新思想流变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1ALB00455

日期：

摘要

柳宗元的政治生涯中曾参与两大政治革新，其一为“顺宗新政”，其二为柳州革新。前者于唐顺宗在位的半年中实行后迅速失败，而后者于柳宗元刺史任上四年里取得成效。无论后代对柳宗元的政治思想和作为的评价是褒或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议论不休。而这两项政治革新所取得的成果确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后代。

柳宗元的仕途分期可分入三个鲜明的时期，即长安任期、永州贬谪期及柳州任期。而他的政治革新思想也跨越了贯穿这些时期，尤其在长安及柳州时能在政治领域上有所作为。他早期参与了王叔文政治集团，随其发动新政改革朝政弊端。其政治革新思想的启蒙，来自于陆质的新《春秋》学的“大中”思想，而陆质也是王叔文集团的一员。而儒家与诸子学说也成为他民本思想的基础理论。

柳宗元任永州司马时无所作为，在长安和柳州则实际参与了政治革新。期间，柳宗元的政思、政策和政绩，是本论文欲阐述的内容。“辅时及物”、“益于世用”、“生人之性得以安”，便是柳宗元政治革新思想的座右铭。而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也引领他为柳州开创了崭新一页，从此脱离落后的穷荒生活，开始文教、经济的蓬勃发展。

本论文旨在探讨柳宗元政治活动成效最显著的时期——柳州任期。为了验证柳宗元的政治思想的流变，本论文亦参考其早期的政治理念，以及他理论方

面的实践，即“顺宗新政”时期的政治革新思想及施政。然而长安与柳州有着时空上的巨大差异，因此所实施的政策未必相同。唯以柳宗元治柳之政绩来看，可知与前期的政治革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和“大中”思想贯穿。而其政治革新理念也不出“利安元元”之务。因此，本论文不仅会谈及柳宗元治柳之挑战与政绩，亦就两项革新活动的异同，探查其政治革新思想的发展、实践，以及流变。

【关键字】 柳宗元治柳；中唐；永贞；政治革新；思想流变

致谢

论文完成之际，心中有许多念想。是一些不舍与畅快的复杂情绪。

回想当初选择此论文题目之因由，乃是上唐宋文选课时曾以柳宗元为报告研究对象。又有感于国家政治情况及人民社会等问题不断，望能借鉴古人的政治思想以获得启发，于是便定下了现在的题目。儒家学士生涯即将随着毕业论文的完成画下句点，心中难免有些许失落。

在此衷心感谢论文指导老师——余曆雄老师。早在年前一次论文分享会即对老师的谈吐和学识仰慕不已，今有机会拜于老师门下实属难能可贵。余老师在论文上不吝惜时间，悉心指点，循循善诱，令学生在遇上论述瓶颈时，能够通过独立思考来越过障碍，尽情发挥个人的观点和析辨的潜力。学生不才，老师的教诲学生未能悉数领会。但此次能跟随余老师研究古代文人，是学习生涯中一个难得经验，收获甚丰。

此外，更要感谢家人的付出与关怀，尤其是父母。撰写论文以来，双亲不在身旁，电话联络嘘寒问暖之余，不时关心论文进度，并适时给予鼓励和开导，或聊家常以舒心。母亲体贴女儿的心思，令容易焦虑的自己能冷静心绪。论文胶着期，每思及母亲安慰的话语都能令心中紧张与压力感暂消，回头重新出发。

毕业论文完成的路途上，深获好友、同学、师长各方面的协助与关心，不能尽述。离别在即，望能各自珍重。满怀感恩之心，向各位致谢。

第一章 绪论

柳宗元，字子厚，是中唐以来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柳宗元祖籍河东解县，因此也被称为柳河东；又在柳州任刺史，得柳柳州之号。他自幼聪颖，博学多闻，21岁中进士之后，26岁再考上博学鸿词科，官至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一生历经代、德、顺、宪四朝，正值国家遭受“安史之乱”余波震荡，从盛唐走向中衰的时期。柳氏家族在高宗之前家世显赫，为一方名门大族，唯至柳宗元的时代，世族已没落如同庶民。柳宗元少负宏图大志，备受父母、家族长辈在诗词文章、为人处事方面的影响与熏陶，有“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柳宗元，卷30，1979：780）”的抱负。为官之后更参与王叔文及王伾为首的政治革新集团，并在唐顺宗的支持下推行反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革新运动。此革新运动仅进行百余天便告失败，引发唐朝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柳宗元更被贬至永州，一去十年。

第一节 研究动机

元和十一年，柳宗元出使柳州刺史，仅仅四年便为当地人文、经济建设贡献良多，政治绩效卓著。柳州人民筑衣冠冢和罗池庙，纪念这位柳氏柳州之长

《艺概·文概》：“柳州系心民瘼，故所治能有惠政。（刘熙载，卷1，

1993: 69) ”为柳宗元治柳之功给予肯定，也对他的关心民意、民生的为政思想作出注解。。

柳宗元的思想以儒家为尊，奉尧、舜、孔子为圣人。其政治思想在有极深的民本观念。他入仕后与刘禹锡、吕温、韩泰等人结交，并习得以陆质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沈德潜对陆质启开后人舍传求经的疑古精神表示赞同，“自啖助、赵匡及陆质，据经而核传。后宋儒得所据，其功不可没也。（卷9，1998: 299）” 是一门继往开来之学。陆质之学舍传求经，被视为“异儒。其治学之法立意标新，政治思想与中唐社会问题契合，成为了王叔文集团的核心思想。此次革新行动改变柳宗元一生，而陆质学说也深植于柳宗元的民本观念里，尤以“大中”思想的影响力最深。

李褊<柳州旧本河东先生集后序>对柳宗元的文章和人格有溢美之词：“柳侯子厚，实唐巨儒。文章光艳，为万事法。（蹇长春，2000: 938）”可历来学者对于柳宗元的政治作为，褒贬不一，更多的是认为柳宗元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尽管他文采出众、天资过人，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针对柳宗元永州时期的贬谪生活、诗文创作与思想，学界已有多番研究与讨论。而他在柳州四年方面的研究也不在少数，对于他的施政与诗文作品，也有所整理。柳宗元的柳州之治最为人所称道，其治理柳州的方针也被各代士人效仿、记载及赞颂。柳宗元治柳成功，其中所包涵的政治革新思想，是可研究的课题。

念及政治思想及实践，便不能忽略柳宗元在柳州之前曾经推动过的政治革新。那是在唐顺宗在位之时的一次重大政治改革行动。寻思柳宗元在柳州所抱持的政治思想，与在此革新时期的政治抱负是否在十多年后仍未改变？若是，

治理柳州时期革新思想会是其前期的政治革新理念的推展吗？若非，两者的不同点为何，柳宗元又是如何利用前期政改的操作经验呢？本论文欲针对此课题做延伸讨论。

本论文将紧扣柳宗元的政思、政策和政绩的阐述展开全文的讨论，除了简述柳宗元一生的政治作为作时期划分，即“顺宗新政”至柳州刺史阶段，也将着重柳宗元辅助顺宗执政期间的政治革新思想的概况，进而细述其在柳州任内所作的各大政治措施。其治柳的功绩，本文欲加以梳理，统和柳宗元在柳的施政脉络。除此之外，本文亦将尝试讨论出柳宗元治理柳州的政治思想流变，即以“顺宗新政”时期的政治革新思想为观照例子，并分析其贬谪前后的政治革新思想之变化与契合之处。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相较于柳宗元在永州的研究，柳宗元在柳州的研究较少。然而，研究柳宗元在柳州的学者仍大有人在。基于本文的研究主弦还在柳宗元于柳州的政治思想面貌，将着重参考相关柳宗元的政治思想综述与流变、治柳政策、贬谪前的政治经历与思想、柳州人文情况等的研究成果进行观察与探索。

孙昌武的《柳宗元评传》出版于 1998 年，内容将柳宗元的生平经历描写得巨细靡遗，上至祖家历史、下至交友作文，将与柳宗元有过交往及影响之人皆提出并详述。此外，此专著也用较多的篇幅来讨论柳宗元在哲学、社会、政

治、文学、宗教等方面的成就，并侧重于他的思想理论层面。因此这本书无论是在了解柳宗元的所处的社会背景及思想历程，或是进一步探析有关柳宗元的独立议题，如“重视‘生人’的政治改革主张”、“关注现实的文学革新理论”等，作者更在书中各处提出了个人独到的见解，为各路学者提供了一丰富详细的参考资源。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对柳宗元的事迹与作品亦有相当详细的注释，在学界被视为可靠的文献，本文亦运用之。

关于柳宗元在柳州的政治思想，从其文集中的篇章可窥知一二。因此，本文也将大量地参考《柳宗元文集》及《柳河东文集》的诗文作品。除了柳宗元本身的文集，本文也参考各家为柳宗元的诗文作品编选的诗文选集，如1999年版谢汉强主编的《柳宗元柳州诗文选读》。此书的强项在于，乃柳州市的“柳学”研究者为选文校注，将诗文中涉及的各种地理、风土人情、史迹等，都能注释得较确实。这是在地学者充分利用地利，亲身前往实地考察，减少注解谬误，对于不能亲身前往根据地的研究学者们，这无疑是相当有助益的。另外，其中所选之诗文也是在柳宗元在柳期间具代表性的，如有关治理地方、关心国事、抒发忧愤等的诗文，能够反映出他当时的生活与思想。

此外，作为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与思想家，不止他的同代人为他作文，历朝历代皆有学者评析他。如韩愈及刘禹锡，便为其或撰写悼念文章、或有书信诗文往来，这对于研究柳宗元在各个时期的情况有相当大的助益。如吴文治编《柳宗元资料汇编》及高海夫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柳州文钞》，前者以编年的方式将各个朝代的文人学者对于柳宗元个人的评析与各种相关资讯都逐个列出篇名及内容，后者以文钞校注为底，集合各家评论于后，

二书排列清楚明瞭，便于查找。若欲了解何人曾为柳宗元作文，及内容为何，两部书籍帮助甚大。此外，《中华大典》的《隋唐五代分典》亦在其列。章士钊《柳文指要》亦是近代一部柳学专著，是作者的巅峰之作，为柳学后学提供他独到的见解。尚有何书置《柳宗元研究》，针对有关柳宗元文章的各种课题进行辨析，更引用古人的精辟见解，同时进行推敲，让许多众说纷纭的柳宗元事迹得以确认。

其次，也不可遗漏正史上对柳宗元的记载。本论文主要参考《旧唐书》、《新唐书》的〈柳宗元传〉、〈宪宗纪〉、〈顺宗纪〉，及各篇列传。新、旧《唐书》将唐代数百年的方方面面都纳入以留后世，诸如唐朝当代的名人君主的文韬武略、诏书铭文，以至于地域情况及文化习俗，都能从中探取，借古之记载，追溯古之人文风貌。而其他史学资料如《全唐文》、宋代《册府元龟》、清代《资治通鉴》，详录历朝历代的诏书制造、史事纪实等，都是可参照的可靠资源。关于元和年间的地理风土资料，本文除了参照《旧唐书·地理志》，也参照唐朝李吉甫所撰《元和郡县图志》。其他县志如《马平县志》中有关柳宗元对柳州文化发展之影响，亦有可观之处。

本文也参考傅璇宗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这部书将唐朝五代的帝皇、文臣武将等历史名人所作之诗文，依系年编入。本文主要参考其中的〈中唐卷〉，即包含柳宗元出生的大历八年至元和年间的文人的文学创作情况，以及柳宗元本身的遭遇与文章，都编入年月。这部编年史提供本文多方面的参考和详实文章活动与年月的资料。唐代文人的文集如韩愈《韩愈全集校注》、白居易《白居易全集校注》、吕温《吕衡州文集》中与柳宗元相关的言

论亦有摘录。尤以韩愈的《顺宗实录》中对“顺宗新政”的记录可以作为主要参考。

其他参考书籍包括杜方智及林克屏主编《柳宗元在永州》、尚永亮《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高海夫《柳宗元散论》、赵伯雄《春秋学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期刊论文及论文集的使用包括何焜〈此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柳宗元与永州风俗〉（《柳州师专学报》）、谢汉强〈柳宗元在柳州时期的诗文创作〉及陈殿新〈柳宗元对西南边疆早期开发的积极影响〉（《柳州柳学研究文集》）、黄永年〈所谓“永贞革新”〉（《唐代史事考释》）等。论文末将详列书目，兹不作赘述。

第三节 论文构思

柳宗元在柳州期间，写下不少诗文，尤以诗作数量为多，其论述主体又多为柳州的人、事、物，充分表现出柳州当时的人文风土、地理环境及历史面貌。因此，本论文将从柳宗元于柳州任内期间所作之诗文着眼，以文本析读、引用史书典籍等方法，并参考历代学者对其人其文的评价，剖析其文辞作品中的背景事件及情思，观察出柳宗元对于治理柳州的观念所在，以及他一生的政

治思想发展。本论文务求以文、史的概念和哲学的辅助，夹叙夹议的方式来探讨。

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基于永州时期的柳宗元并无实际的政治表现，因此无法更切实地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因此有关柳宗元永州时期的政见，本文拟不多作讨论，而是集中研究柳宗元从政早期及柳州任期的政治思想与活动为主。本文的主旋还在柳州的政绩与政见，而“顺宗新政”的政治改革措施为辅。

首先，本文将在第二章概述柳宗元从青年至中年的政治分期，以及他个人的政治思想启蒙与拓展之情况，以备第三章有关柳州的政绩，以及第四章有关其政治思想流变作关联讨论。探析柳宗元治柳的政治理念的前提，需对其入仕以来的政治活动有所了解，掌握其政治分期之轮廓。因此，此章第一节将柳宗元的仕途划进三个分期，即贬谪前、永州贬谪期及柳州任期。在永州，柳宗元一直处于悲伤凄楚、满腹怨愤的状态，同时对于北还是期盼万分，此点从其当时与友人的书信及诗文作品可见一斑。直到元和十一年他获赦回到京城，不到半年又调遣至柳州。此次从司马升至刺史之位，名位升官，实则另一种贬谪。柳州地处南夷之地，蛮荒野地实难治理。纵然情况与条件恶劣，柳宗元却能大力整治及改革柳州，赋予其新风貌。观察其当时之文，不乏抒情之作，对于当地风土人情等的描写和感慨也有相当多的描绘。通过介绍这三个时期，可对柳宗元一生的政治活动脉络有所掌握。而本论文选定柳州任期为主要的议论范畴，此节的最后将阐述相关原因及此时期的重要性。此章第二节，将进入探讨柳宗元的政治思想之渊源与发展，既包括其政见的启蒙。还有“顺宗新政”至

柳州革新时期的政治革新思想之延伸与更新。柳宗元的思想启蒙者，应是陆质以及吕温，这两位“在“顺宗新政”时期对于柳宗元个人的政治思想有着莫大的影响。但柳宗元却在随后于永州展开了十年的政治空窗期。这段沉寂一直到成为柳州刺史后才被打破，从新衔接起青年时的政治理想并加以实践。此节讨论主要为第四章的论述预留伏笔，在讨论政治革新思想时能有所参照。

接着，本论文第三章将通过大量文本析读的方式，深入剖析柳宗元在柳州的各项施政。柳宗元到任柳州仅四年，但所作之贡献备受柳州人民记忆和推崇，甚至在其逝世后，修建了一座成罗池庙，将其奉为罗池神。因此，本文将通过细读多篇柳宗元在柳州所写之文章及诗作，观察柳宗元治理柳州时期在各个领域中的改革与整修，包括对于文化、教育、社会制度的革新贡献。此章也将讨论柳宗元在这条改革路上遭遇的难题。

此外，本论文的第四章将尝试以柳宗元遭贬之前及之后的政治革新思想及实践为讨论主题，并比较其在长安任职时期及治理柳州时期的政治革新思想，两者之间的契合及差异之处。此章也同时分析柳宗元贬谪前后，即经历“顺宗新政”事件、担任永州司马、柳州刺史之后，这位文人政客所持有的政治革新思想在历史与地域变迁之中所展现的变化与融合。碍于篇幅以及欲集中讨论的考量，本章与第三章都将选择与柳宗元有重大关联的事项为讨论之课题。

结语处，本文将以前文所作之论述，总结柳宗元在革新政治的事业里取得的政思、政策和政绩的流变，在并以此命题未来可发展之处加以涵盖。

第二章 柳宗元的仕途分期与政治革新思想的发展

柳宗元的仕途大部分时间处于贬谪的境况，《韵语阳秋》云：“柳子厚可谓一世穷人矣。”（卷 11，： 146）是指他一生终不得志的情况¹。但他在贞元末年进行的革新运动和柳州四年的能吏表现都凸显他个人杰出的政治思想，是具有相当的创见、积极性和时新的。而此章将着重介绍柳宗元的入仕以来的政治分期，以了解其仕途的起落转折情况，并主要分入三期，以柳宗元入仕为开端，柳州任期为结束。此外，此章也将在第二节阐述柳宗元政见的启蒙以及其各时期的政治革新思想。

第一节 柳宗元贬谪前后的仕途分期

来自官僚家庭的柳宗元，受父母影响而博览儒家经典及诸子、史书等，以十三岁之龄，代崔氏中丞写了〈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上奏皇帝，展现了他为文的能力，初在文坛崭露头角。柳宗元也曾随父在外宦游，体会时代动荡百姓疾苦，少年便抱有大志。他后来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提到“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柳宗元，卷 34，1979： 876）”，表现出他想要有所作为的志向。但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他后半辈子皆在贬途，至死都未曾真正北还。其仕途是峰回路转，结局令人惋叹。但这样坎坷的人生却又跟他的为

人思想和政治环境息息相关。本篇将介绍其仕途的三个阶段，即长安任期、永州贬谪期及柳州任期，以提供各阶段之情况一宏观概念。

第一类 长安任期（798-805）

贞元十四年（798），26岁的柳宗元第二次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并成功登科。早在柳宗元21岁时便中了进士，期间因父亲柳镇过世而不能参加当官必经的考试，即吏部的“诠试”。直到贞元十二年，柳宗元三年服丧期满后才能应考。博学鸿词科考录取后，他受命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从九品上，职务为国家图书馆作校对及整理经籍图书。

此时的柳宗元虽然只是一名从九品上的小官，却是处在当时士人仕途发展的一个理想开端。依当时叙官的惯例，进士出身者再授予校书、正字等职，后出任畿县令、尉，再回到台、省做郎官，为入仕后一快捷进身的蓝图（孙昌武，1998：50）。因此柳宗元的仕途起步可谓十分顺利，只需按部就班，假以时日必能攀居高位。

在长安时期的柳宗元交游甚广，尤以文士为多。他少年才高，文章之好不在话下，又能引古辩今，论起政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韩愈形容他当时是“少精敏，无不通达”、“俊杰廉悍（韩愈，1996：2391）”，一时间名声大噪，仰慕者闻名而至，欲与之相交。

贞元十七年（801），柳宗元获升任蓝田尉，后两年调为监察御史里行，正式进入中央执政部门，位低权重，是在御前进言的角色。也在此时，柳宗元通过其同批进士的同学，其一生的知己——刘禹锡的介绍，以朝中新贵之姿认识当时以“二王”——王叔文、王伾。王叔文、王伾为唐顺宗李诵太子的侍读，前者精于棋艺，后者善于书法。两人出身寒微，在政事上却颇有看法，深得李诵赏识器重。太子与“二王”成为朝中主张革新的政治集团，而不同意改革朝政的老臣们以及宦官集团则与之对立，相互之间的摩擦与矛盾频生。而柳宗元素有文名，又怀抱远大的政治理想，自然成为了革新集团急于拉拢重用的对象。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德宗驾崩，王叔文等人扶持李诵登基，但此时的李诵已中风，不能言语。一切朝政事务交由王叔文等人处理，与反对革新的朝中与宫廷势力抗衡。为巩固势力和执政权，顺宗将集团成员韦执谊擢升为宰相，“二王”则任翰林学士之位。而柳宗元亦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正六品官员，相当于现在的教育文化部副部长。柳宗元原任监察御史里行为八品官员，仅隔两年便越级拔升，实属“超取显美”（柳宗元，卷 30，1979：797）。柳宗元又是直接参与辅佐唐顺宗登位，并身在革新集团的中心，时称“二王、柳、刘”。顿时间，柳宗元成为朝臣中的大红人，前途不可估量。

王叔文集团“暴起领事（柳宗元，卷 30，1979：780）”，迅速展开一系列声势猛烈的内部改革，大力扫除朝中积弊旧习。主要改革包括：如禁宫市及五坊小儿、出宫人、削减赋税、裁冗员、贬贪官、举贤才等。然而，此次的政治革新仅维持了不到半年便告失败，史称“永贞革新”。需说明的是，“永贞”这个

年号乃是唐顺宗的禅位诏书首次提出的年号。该诏书颁布二天后，唐宪宗即登临帝位。因此，这项革新运动不曾发生在唐宪宗掌朝时期，而是在贞元二十一年，也就是唐顺宗在位期间所施行。学者黄永年亦称“‘永贞革新’者，是近二三十年来某些教科书上出现的新词语，用来肯定唐顺宗时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的活动（黄永年，1998：373）”云云。因此“永贞革新”用于此革新运动未必妥帖。此革新运动发生在唐顺宗执政期内，主要目的是翻新朝廷气象，也实施了不少新兴政策，本文拟以“顺宗新政”代之。

不可讳言的是，青年的柳宗元官场经验不足，在与朝中众臣的交往以及料理政务时都显得不够成熟（梁鉴江，1999：81）。如同政治领域里的小婴儿，柳宗元也承认自己在新政期间是“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卷15，1979：433）”，只知勇往直前，不思旁人的目光和想法，终招来嫉妒和怨愤。尽管王叔文集团的政绩是如此卓著，但朝中势力反对革新的声浪，一直未曾停歇。依靠病重的唐顺宗上位执政的王叔文集团，根基其实并不稳固，加上成员多属少年得志的热血青年，在朝廷树敌无数，不如老臣及宦官们的老成持重，在皇宫势力根深蒂固，与宦官集团联手。两方的角力胜负其实早已分明。贞元二十一年（805）八月初，随着顺宗禅位，宪宗登极，并改元“永贞”，王叔文集团一律遭受贬罪，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除了王叔文和王伾遭软禁，先后赐死及病死，集团的中坚分子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及其余六人皆被贬至各州任司马。

“顺宗新政”虽然以失败收场，却是柳宗元医生中最激烈、具标志性的政治行革新动，此行动甚至可以说是为唐朝中兴掀开了帷幕，打下改革朝政的基础。青年的柳宗元在长安的任期就此告一段落，他一生再也没有回京任职，而

这个时期的政治活动是他的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里程碑。诚然，这场革新让柳宗元攀登至事业的顶峰后，急剧下滑到一败涂地的谪臣身份。

第二类 永州贬谪期(805-815)

柳宗元等八人原来不是被贬为司马的。他初贬邵州刺史，为正四品的正职，虽是重罚却也只算是被斥出朝。可就在前往邵州的途中柳宗元再度接到诏书，加贬永州司马。

永州，古为零陵。永州属江南道，约现今湖南省西南部，潇、湘两水汇通处。元和时代的永州，下辖三县即零陵、祁阳、湘源三县。天宝年间，永州有户二万七千四百九十四，人口十七万六千一百六十八（刘昫，卷 40，945/1975：1615）。“安史之乱”后，全国百姓经历战火洗礼，流离失所，人口大幅削减。至元和年间，永州仅余户八百九十四（李吉甫、贺次君，卷 29，813/1983：709）。这前后的数据也显示，即便是永州这样荒远的地带，人民也受战乱侵害而四处逃亡，致使人口锐减。

永州是“夷獠之乡”（柳宗元，卷 30，1979：180），柳宗元在与友人来往的诸多书信中，都曾描述当时永州的地理位置及山林景况。地处楚南的永州，属五岭北麓山区（何焘，2002：19），为越人的聚集地，除了汉人，也有瑶、苗等少数民族居住，因此当地百姓的穿着发型或与中原人士相异。如“百越”人衣襟搭于左，不似中原人惯常的右襟。结成椎状的发髻，也成为了异族的标志。除此

之外，永州自然生态丰富，毒虫猛兽蛰伏于山林草丛间，生活环境险恶。还有永州冬冷夏热的天气，夏天发热头昏夜不能寐，冬日积雪深不能行，这些情况都在柳宗元的多篇永州所作的诗文中可见。

永贞元年（805）年末，柳宗元到任永州，职务全衔为“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从六品上，向来由“内外文武官左转右迁者递居之”（白居易，卷6：249）。所谓“员外置”便是编制之外的人员，并有明文规定此类官员不得干涉在地政事，因此柳宗元这个司马形同“闲员”，并无实权，更无官舍（孙昌武，1998：90）。

柳宗元在短短半年内所经历的大起大落，令他内心充满苦闷和怨愤。他一位饱读诗书的长安人，骤至永州，身心都不习惯当地的风土。陪同他前来永州的老母亲卢氏到此半年便病逝，使早年丧妻的柳宗元变得更加无所依靠。随之一同来到贬所的，还有他的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这两位亲戚兄弟，与他同甘共苦，生死相随，柳宗元也曾为他们作文。初来乍到的柳宗元，便在寺庙中居住。

唐宪宗即位之后，稍微提振了朝廷士气，加之录用了多位能臣为相，朝纲政务皆有显著地改善，呈现一派新气象。朝廷如此振作，令热衷于政治的柳宗元对遇赦复出怀抱了莫大的期盼。然而自元和元年正月的一月、六月、八月，唐宪宗三次大赦天下，八司马等人却都“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刘昫等，卷14，945/1975：418）。

在永州的前五年，柳宗元所住龙兴寺房舍四度遭遇火患，损失生计。这五年间，柳宗元不断寄出书信，向朝中旧识及权臣求救，期盼他们在御前为其说

好话，让他早日获赦北还，返回京中任职。然而，无论是寄给当时的宰相、京兆尹或好友，一封封的书信都如石沉大海。永州为远荒，医药设备等皆十分落后不齐，正是雪上加霜。身上百病缠身，心上千愁难消，令曾经“踔励风发”（韩愈，1996：2391）的官场明星被折磨得暗淡无光，至“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柳宗元，卷30，1979：779），憔悴不堪。

直到元和五年（810），柳宗元收到了来自许孟容的慰问信，令他对于北还之事燃起新希望。而早在元和四年，曾是革新集团成员的程异，也从司马之位复被启用。自从“顺宗新政”失败，朝臣对革新集团和柳宗元“诋诃万端，旁午搆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柳宗元，卷30，1979：780），直到如今方有回音，柳宗元欣喜之余，除了给许孟容回寄一封千字长信，表达自身的困顿和惨境，也给萧俛、李建、裴埒、顾十郎等人寄出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书信。然而这些求助信最终也只是徒劳无功。

柳宗元先前一直居住庙宇不曾建盖屋舍，前后从龙兴寺迁至法华寺西亭，至元和五年终于在潇水西的冉溪边买地筑屋。柳宗元在〈送从弟谋归江陵序〉便提到“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卷24，1979：634）”的想法，显示出他已决定为定居永州作长久计，而这与他在永州前五年欲积极复出的心态是有所差异的。

也是这一年，柳宗元经历女儿过世，迁家至冉溪，也就是之后易名的“愚溪”。此次迁居，箇中原因有几，其一为“爱是溪”；其二为旧所火灾频发；其三为已纳妾，需迁出寺庙，自立门户；其四愚溪环境幽静柔美，利于创作

（杜方智、林克屏，1994：257）。这次迁居乃是柳宗元在永州贬谪生涯的一个转折点。经过多次的书信求援不得要领，“复起为人”的一天似乎再也等不到，此时的柳宗元心中虽仍是愁苦，却也渐渐放下对于北归复位的期望。

这时期的柳宗元经过五年时间沉淀被贬的心情，将大部分的愤慨激动的情绪转为较收敛自省的情感。《溪居》曰：“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柳宗元，卷 43，1979：1213）”，柳宗元在愚溪新居过着村居生活，别有一番隐士的超脱之感。然而，他为《八愚诗》撰写的《愚溪诗序》以及《愚溪对》都一再显示其心中的凄苦，一句“以予故，咸以愚辱焉（柳宗元，卷 24，1979：642-643）”的自嘲，令人痛惜。但柳宗元自小个性坚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也不怀疑，此借愚溪之名来塑造己身不取容于社会的志士形象，表现他不屈不挠、矢志不移的人格。此时的柳宗元，书写的诗文不如前五年那般急欲表明自己的清白与冤屈，而是倾向于自我解嘲，并习与现状，暗自蓄养创作文学与理论之精神。

既然居于闲职也无权管理永州政务，柳宗元只有寄情于山水，游历永州乡野，并在文学与哲学思想上挖掘，创作了许多诗文作品。退出政治舞台的柳宗元，始终心系于社会与人民。因此他谪居溪畔，与家中主妇过上了几年平静的田园生活。他融入民间，参与劳作，耕种锄地，因而了解人民的生活，借由散文及诗赋描写百姓面对的生活困难，如《田家》三首、《捕蛇者说》等。

初到永州的柳宗元已浑身是病，深居冉溪后身子虽有些许好转，却又染上了南方易发的脚气病。田居生活始终不能聊慰柳宗元内心的不忿与煎熬，他将

悲戚悔悟写进《愚溪诗序》及《愚溪对》，愚己愚溪。又见山峦围绕溪居，写下《囚山赋》。他心中凄苦，可见一斑。

元和十年（815）正月，新入相的韦贯之应朝廷形势所需，急欲招募人才，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得诏返回长安。十年穷途在永州，柳州元由一个政治新星，已转变为一个身不由己的罪臣。这么长的一段岁月中，柳宗元撰写《非国语》表达自己的政治意见，但他也只能如此纸上谈兵，并没有任何政治作为。这十年对柳宗元来说是凄苦潦倒、满怀惆怅、有志难伸、哀怨莫名。但他毫无转圜的余地，只能从官场退出，卸下执政的权力，在政治领域中沉寂十年。

第三类 柳州任期(815-819)

柳宗元十年贬谪生涯至此似乎有了明朗的转机，其实不然。话说柳宗元于元和十年二月高高兴兴抵达长安，不料刘禹锡的一首桃花诗，竟引来昔日政敌的攻击，招致唐宪宗的迁怒，三月十四众人又被下诏往远州任刺史。

起初，柳宗元获诏赴任柳州刺史，而刘禹锡获播州刺史。柳宗元念及刘禹锡老母已高龄，眼见挚友与老母亲可能自此永诀，便乞求朝廷将两人的任所对调。在当时，播州比柳州更为荒僻遥远，绝不是更佳选择。朝廷最终更改朝命，让刘禹锡改任连州刺史。而柳宗元以柳易播，成就了“士穷乃见节义”（韩愈，1996：2392）的千古佳话。

柳州，地处广西中部，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区，下辖马平、龙城、洛容、洛封及象县。开元年间，柳州共一千三百七十四户；元和初，一千二百八十七户（李吉甫、贺次君，卷29，813/1983：926）。比之永州，柳州人烟更为稀少。

元和十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抵达柳州。就在同年的七月，其从弟柳宗直病逝，柳宗元悲痛不已，作悼文〈祭弟宗直文〉、〈志从父弟宗直殡〉。一年后，另一名兄弟柳宗一也离开了柳州。

一直病弱体虚的柳宗元，到了柳州便“奇疮”、“霍疾”先后而至，令当时仅四十四岁的柳宗元出现五脏六腑皆痛、气息衰竭的生理状况。尽管如此，柳宗元就以如此孱弱之躯，为振兴柳州社会贡献了他的余生。

柳宗元将奴婢解放、普及文化教育，亲身化育当地人民，教导他们掘井取水，发展医药、经济、教育与文化事业等。短短四年，柳宗元为柳州人民带来前所未有新气象，以仁政治理地方，深获百姓爱戴，尊称他为柳柳州，甚至在他死后为他建了衣冠冢和庙宇，世代供奉。

柳宗元身在远州，心系国内大事。在柳州期间，正逢北方大地藩镇叛乱。柳宗元写了〈古东门行〉，表明力主出战平乱。元和十二年（817），柳宗元写下《平淮夷雅》两篇，歌颂裴度与李愬大胜平淮西之役。隔年，朝廷擒杀李师道叛党，柳宗元再进〈柳州贺破东平表〉、〈贺中书门下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贺平淄青后肆赦表〉等数篇文。柳宗元作为南方偏远州属的小官，本无需为北方战事发声或上表道贺，而此番热烈地书文上呈，不仅是表达对将士们的赞颂，也表达了自身坚决反对藩镇割据的政见。柳宗元以生命最后时光，将他自身的政治理念贯彻始终。

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八日，柳宗元于柳州逝世，享年四十七岁。柳宗元为官清廉，家属无力治丧，幸得裴行立为其筹措丧葬费，卢遵负责办理其身后事，隔年七月将他归葬万年县先人墓侧。

长庆二年（822）七月，柳宗元逝世三年，柳州子民建成罗池庙，将柳宗元奉为罗池之神。

长安任期是柳宗元的政治起跑期。他在政途上勇往直前，表现出拼搏和勇于实践的精神。虽然时势将这位热血青年扳倒，但这段时期的政治革新经验为他日后的治柳之政提供了借鉴。而永州贬谪期让柳宗元能沉静心思，专心于写作，让他无论是文学理论或是政治思想上都能获得较完整的文字表述。柳州四年是柳宗元短短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但就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他将一蛮荒野地、民不开化的乡城改造得欣欣向荣，发展了文化、教育、医药、公共建设等等。这些贡献与成就，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不止对整个唐代而言，对柳宗元个人也是莫大的成功与事业。一个在永州荒土待了十年的谪吏，能够在柳州南夷之地作出如此影响深远的功业，其中的思想理论与渊源是值得去深究的。相较于长安与永州，一为难产的革新事业，一为无职无权的司马，其政治革新的作为在柳州方有比较完整的呈现。因此，柳州任期作为柳宗元仕途最光辉的岁月，也成为他政治革新思想之实践的重要时期。

第二节 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之启蒙与延续

柳宗元贞元十四年入仕，加入王叔文政治集团参与“顺宗新政”，后被贬谪至永州，再到柳州任刺史，勤勤勉勉四年后死于任上。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柳宗元回忆“顺宗新政”中的自己以及同伴，字字恳切，句句哀怨，虽言苦果乃咎由自取，却也尽露不卑不亢之情。柳宗元认为自己是不得志之人，希冀“取贵于后（柳宗元，卷 30，1979：783）”，表现出儒家思想中积极进取、坚贞不移的精神。他表明自己参与改革，“唯以中正信义，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柳宗元，卷 30，1979：780）”弘扬尧、舜、孔子之道之余，还要为苍生谋取太平安乐的生活。章士钊认为此“乃子厚毕生学问与志愿所在（2000：679）”，是他一生的政治理想，也是柳宗元倾一生之力欲完成之梦想。而包含在这“利安元元”中的，还有他的民本思想。这些个政治理想，首先还是由中唐“新《春秋》学”的陆质之学说启迪。

未谈及陆质之前，得先了解柳宗元学习新《春秋》学的契机。《祭吕衡州温文》云：“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洎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柳宗元，卷 40，1979：1053）柳宗元得习于陆质之学，乃是通过吕温而了解的。吕温，河中人，可说是柳宗元的同乡。他与柳宗元是同届进士及第，也参与博学宏词科，并授集贤殿校书之职。与柳宗元一起踏入官途的吕温，两人有深厚的同学与同事交谊。之后，两人更一同加盟王叔文政治集团。而吕温“以弱龄获谒于公（卷 8，2003：655）”，在

陆质门下学习《春秋》学多年。而柳宗元在〈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对吕温的为人和为学都极为推许：

《春秋》之元，儒者惑惑。君达其道，卓焉孔直。圣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变化，动无不克。（柳宗元，卷9，1979：218）

两篇悼文中不仅指他深得陆质的《春秋》学之精义，自己能从于陆质门下进而“闻道”，也都是受吕温的影响。〈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描述柳宗元听闻吕温等研习陆质的学说，“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卷31，1979：819）”。从此处也可发现柳宗元认为《春秋》之学到了陆质才开始发扬光大，且尊陆质的学说为圣人之学。陆质作为他的政治革新思想启蒙者，吕温可以说是牵线人。

陆质，字伯冲，师事啖助，与师友赵匡、助子啖异凝思聚力，共著《春秋集传纂例》、《春秋辨疑》二书，又自著《春秋微旨》三卷。陆质“尽传二家学（欧阳修、宋祁，1060/1975，卷168：5127-5128）”，此“二家”即指啖助及赵匡，《春秋纂例》中亦常见他同举“啖赵”之主张，或以“啖子”、“赵子”尊称二人，可见其理论思路皆承继二者。啖助，新《春秋》学的创始人，著有《春秋集传集注》、《春秋统例》。而赵匡，与陆质亦师亦友，同为研究《春秋》的学者。啖助、赵匡、陆质三人，为新《春秋》学的代表人物，前二者乃先驱，其人其文已无传于后世，其思仅能从陆质的撰述中得见；而后者为弘扬新《春秋》学之人。因此，中唐新《春秋》学可以说是发端自啖助，集成于陆质。

所谓的“《春秋》学”，最初为孔子及其弟子对《春秋》的阐释，后来历代的儒者与经师又在此基础上陆续增损经义，才产生了在各个朝代及统治者之下多种多面的《春秋》学说（赵伯雄，2004：12）。至唐朝，经学已显衰颓之势，这不仅是由于汉代《春秋》经学研究已达到一定高度，而难以突破。“唐人对《春秋》经传的利用，‘议礼’是其大端；相比之下，‘议政’的内容倒是比较少见的。（赵伯雄，2004：369）”，这反映出当时的《春秋》对于政治上的讨论已无多大作用，自然也就越少人研习与引据。啖助等人显然有异于当时的儒者，他们依旧重视《春秋》的政治宣导作用，而且开始以有别于章句之学的研究方法来治《春秋》。因此，将这样的现象视为啖、赵、陆“舍传求经”的开端亦无不可。

那新《春秋》学的“新”又是何来呢？《春秋》有三传，〈左传〉、〈公羊传〉及〈谷梁传〉。汉唐盛行以三传之经义为研究范本，或兼采三家，或取一家之言之余，兼取二家之说以作裨补。（胡可先，2000：74）啖助治《春秋》却不划地自限，反而是合三家之言，择其善者，再以己见作补充，陆质便是承袭此法作《春秋纂例》。清代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指出：“淳本啖助、赵匡之说，杂采三传，以意去取，合为一书，变专门为通学，是《春秋》经学一大变，宋儒治《春秋》者，皆此一派。（1954：59）”将分为三家的专门之学，统汇成一书之学，并且侧重于学者个人对经义的主观阐释与见解，力求索得《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将三传中不符合人情义理之处剔除，往更符合现实的方向解经。如此治学，是《春秋》经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不仅影响了宋代儒者治《春秋》的方法，在着重三传章句训诂的唐代，也可视为异军突起，不可不谓之“新”。

陆质作为新“《春秋》学”的核心人物，也是王叔文“顺宗新政”政治集团的成员。自“安史之乱”发生，唐盛世衰落，各种社会问题纷至沓来，外有藩镇割据日益严重，内有权贵宦官弄权，不仅朝政颓废，滋扰生民的事件更是层出不穷。而陆质《春秋》之学，抱着批判和怀疑的精神治学，具有革新传统的意味，其因事立意、辅时及物的理念，与中唐现实社会及政治问题产生了紧密联系。这也是王叔文等以革新政治为理念的组织，招纳陆质加入的原因。

〈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一文中可见柳宗元对陆质是十分仰慕的。他“恆愿扫于陆先生之门（卷 31，1979：819）”，后因为自己被贬远州，而陆质又身染重病，他喟叹自己未能与陆质多讲讨学问，之后仅从凌准处得到陆质其他的著作。柳宗元对于陆质的评价极高，〈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云：“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卷 9，1979：209）”认为陆质已得《春秋》之体要，让人人都可以学习圣人之道，其功德是巨大的。而从柳宗元的著作可发现其对陆质《春秋》学的接受与发扬，是非常深刻的。

柳宗元以“名章大中，发露公器。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卷 9，2008：132）”来概括陆质的政治革新思想。而“大中”思想贯穿了他一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大中之道”主要以“生人”即人民为主，以尧、舜之道为治理国家的楷模。因此“大中之道”可以视为“圣人之道”、“圣人之意”。柳宗元做如此概说，便是将“大中”思想与民本思想挂钩。然而，《新唐书·儒学下·啖助传》云：“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

唱之。（欧阳修、宋祁，1060/1975，卷 200：5708）”这是批评之语。但从中可发觉，实际上由陆质继承的啖助《春秋》学，它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借助圣人的学说，来发扬自己在政治上的见解。因此，新《春秋》学倾向于辅时及物之道和经世致用之学，其学说的建构目的在于革新除弊。这样的学说深深影响了柳宗元个人的政治思考，以及王叔文集团。柳宗元也以自己的解释，使新《春秋》学的核心理念——“大中”俨然成为他的“利安元元”的中心理论。而这些想法在《时令论》和《断刑论》中都所阐发。如〈断刑论下〉中便提及“大中”思想的核心之所在：

当也者，大中之道也。（柳宗元，卷 3，1979：91）

“当”者，体现了“大中之道”。而所谓“当”，便是为政者需要去遵循的道理所在。《荀子·不苟》曰：“当之为贵。”、“当者，谓合礼义也。（卷 2：37）”荀子认为“当”是要符合礼义的。事实上，“当”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得当、适当，即只要能够迎合社会改革的需求，在“辅时及物”的取舍标准中，取其“当”者，便是“大中”，便是利民之政。

柳宗元有一篇十分有名的政论文章——〈封建论〉，内容为批评周代的封建制度，并提倡郡县制，以维护中央集权制度。这样的论调可以说是受了新《春秋》学的影响。如〈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云：

于‘纪侯大去其国’，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卷 31，1979：819）

这不只是对陆质的赞语，也将他对《春秋》的诠释与注解做了一个概说。陆质为新《春秋》学被视为“异儒”，主要还在于他大胆舍弃三传的注义，更

多的直取《春秋》以抒发自己的政治谋略。譬如“纪侯大去其国”句，在其他传义中都解释为支持分封制。但事实上中唐社会便是备受边境节度使叛乱为祸的困扰，分封制并不适用。陆质将此句解读为《春秋》提倡尧舜的“公天下”而反对三代以来的“家天下”的治国思想（寇养厚，2000：15）。意即周朝将土地分封致使诸侯划地为王，天下大乱，这是“家天下”的纰漏。而“公天下”是更为妥当的治国方式。而柳宗元对分封制大力批判，不仅是他对陆质学说的继承，同时也象征他对当时的藩镇割据势力的反对态度。

总而言之，陆质的学说对柳宗元参与政治改革有着启蒙的作用。《春秋集传纂例·改革例》中对于改革的说法：“法者，以保邦也。中才守之，久而有弊。况淫君邪臣从而坏之哉！革而上者比于治，革而下者比于乱。察其所革而兴亡兆矣。（陆质，卷6，册146，2003：473）”陆质之学极为侧重改革之精神，特立此章题大作文章。他的思想在于以法律政令作为改革的武器，使上下得以治，如此便能保国安民。如陆质这样的思想学说，是朝代更迭、社会丕变的时代因素而生发的。柳宗元是为社稷人民斗争的一介志士，自然而然附着在这样的政治理论上，并多方面的汲取其中的思想，用于阐明自己的为政思想，也化为政治行动的理论依据。陆质是柳宗元在政治革新思想上的启蒙者，其学说也让柳宗元能借力发力，建立自己的政治思维。

柳宗元在朝中是“踔厉风发”的革命斗士。但一朝被贬为千里之外的司马，他便变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知识理论和雄心壮志，竟是无处可施展。柳宗元在永州时，虽常关心民生，与农居邻人相互来往，甚至有〈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中“俚儿供苦笋，伧父馈酸楂。劝策扶危杖，邀持当酒

茶”（卷 42，1979：1118），如此亲厚的交谊。但他位居闲职，不知州事，虽有心作事，却无权作事，在政治上完全无法作任何的施展。谪居永州期间，他更多的是寄情山水，勤于撰述。柳宗元在永州的贬谪期，历来被学者们视为他文学思想理论的巅峰时期。而韩愈更认为若当初柳宗元获救官复原职，仕途明朗，却因此无法成就像现在这样流芳百世的文学事业。他用“以彼易此，孰得孰失”（1996：2393）的反问，不仅是肯定柳宗元非凡的文学成就，也暗示永州贬谪生活对其文学思想理论的影响。从现存的柳宗元作品集及历代研究资料来看，在永州的十年，柳宗元大量地发展他的文学创作、思想与理论。而永州的前五年柳宗元作了《非国语》，后五年则多纵情山水，抒情文笔较多。他的政治思想与活动，尤其是政治改革行动，可谓是进入了一段漫长的沉潜期。

尽管如此，废置永州十年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得以在柳州延续发挥。长期的沉寂于政治舞台，并没有耗尽柳宗元的革新政治之精神。元和十三年，柳宗元给李愬的〈唐雅诗启〉：“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无憾。（卷 36，1979：917）”文中除了表达他“文以明道”之志，还包涵其不屈不挠、不自弃的信念，上任三年都凭藉一份补偿心态。而其所欲“补”者，无非是青年时未能完成的革新事业。

柳宗元治柳完整体现了孔子“庶、富、教”的为政思想（戴义开，1993：149）。“庶、富、教”思想来自《论语·子路》：“子曰：‘庶矣哉！’冉有曰：‘即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即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朱熹，2012：144）”事实上，早在真元十五年，柳宗元尚是集贤殿书院正字时，便作〈柳常侍行状〉（施子愉，1958：24）其文曰：“耕夫复于封

疆，商旅交于关市。即庶而富，廉耻兴焉，即富而教，庠塾列焉。（卷 8，1979：182）”柳宗元阐发的孔子治民思想，即是让老百姓能脱离穷困，衣食无忧的时候，再将礼教知识传授给他们，如此便能化育万民。民知礼守法，国家自然富裕无乱。

而这样的政治革新思想体现于柳宗元治理柳州时，为了祛除柳州人民的迷信活动，除了修建孔庙，还复兴大云寺。大云寺乃佛寺，是以弥勒佛为主的宗教祈祷场所。除此之外，柳宗元在柳州也入乡随俗，出席和主持各种乞求神活动。如〈雷塘祷雨文〉是为祈雨而作，〈祭井文〉是掘井得水利后作。前者予雷神，后者予水土之神。柳宗元在推广孔子的礼教思想之际，又以“神道设教（王弼、孔颖达等，1999：97）”的方式来教化柳州子民。而这种“统和儒释”、“神道设教”的想法，在元和十七年〈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初见。但柳宗元是务实之人，他确实笃信佛神吗？裴行立曾命他为其兄弟裴某作〈故处事裴君墓志〉，文中对其父裴伯言“议官及浮图事独出（卷 11，1979：287）”表示赞赏。据《新唐书·李叔明传》记载，裴伯言曾针对佛教、道教导致“夷狄不经法，反制中夏礼义之俗也（欧阳修、宋祁，1060/1975：4758）”之弊端，进言应限制僧尼道士的户数，以及收回寺庙、道观等。该提及裴伯言之墓志作于元和十四年，柳宗元尚在柳州刺史任上，且行政已四年，却尚存对前辈议教的念想，可见柳宗元并非完全赞同佛教、道教的流传。

柳宗元既有“欲投章甫作纹身”的领悟，缘于他深知柳州人民尚未开化。柳州民最大的弱点便是缺乏礼教知识，而让精神沦于鬼神之说。若要治理好柳州，便要在此点上下功夫。而柳宗元传播儒家思想、佛教教义、祈求神灵，其

出发点皆是为了民之利。这就回到了他的“大中”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如他将儒、佛、道和合，祭神、建庙，将儒家思想授予民间，可谓将“教夷之宜（柳宗元，卷 28，1979：753）”作了极致的发挥。这个“宜”之所至，也就是“当”之所至了。“大中之道”在柳宗元治理柳州的政治革新思想上，就此浮现。

诚如田锡〈题罗池庙碑阴文〉的感慨：“以是知为仁者未必获祐，修德者或亏多福。（吴文治，1964：21）”柳宗元的命途多舛。但柳宗元踏入政途，前后二十余年他始终坚持和贯彻自己的政治理想。间中十年的断裂，并没有让他为民服务的精神消失殆尽。参与“顺宗新政”的初衷，即改革内政，施行善政，为百姓造福。为柳州刺史，更力尽一州之长之责，行惠民政策，务必以民之利为目标来施政。其所作所为皆基于其一贯的民本思想，而其理论的依据则为新《春秋》学的“大中”思想。

第三章 柳宗元治柳州的挑战与政绩

元和十年，柳宗元由长安走马上任柳州刺史。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的长征，他将之称作“万死投荒”。十年的永州司马，摇身一变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固然是背负着郁卒与苦闷的心情离开长安，却仍抱有“是岂不足为政耶”（韩愈，1996：2392）的念想。柳宗元在〈谢除柳州刺史表〉中可见，虽是奉予朝廷的文章，却不能忽略其中对“皇风不异于遐迹，圣泽无间于华夷（卷 38，1979：1001）”伟大目标的宣言。而永州的生活经验，柳宗元对于柳州当地风土民情便能够深有体会，进而利用自己的职权造福当时的柳州百姓。本章将进入讨论柳宗元在柳州的政治表现，阐述柳宗元在柳州面对自然环境、风土人情、个人心理因素等的各种问题，及解决方案。第二节也将接续治理柳州之挑战，讨论其治柳的政治绩效。

第一节 治柳之难

韩愈〈柳州罗池庙碑〉曰：“柳侯，生能泽其民，死能惊动福祸之。（韩愈，1996：2597）”引用此句并非意在宣扬柳宗元的神灵，而是韩愈对柳宗元治柳的评价之高，以及柳州民对柳宗元的敬仰之深，只此一句话便可得知。单看柳宗元为柳州作出如此巨大的贡献，以至人民愿意如供奉孔子一般，为他立庙，尊其为神，令人不得不有此一问：治柳究竟有多难？事实上，柳宗元治柳存在着

外在与内在的挑战。外在者，既是柳州在地的政经文教与地理环境因素；而内在者，便是柳宗元个人的家庭状况以及心理与生理因素。

首个外来的挑战便是柳州严峻的自然环境。前文述及，地处广西的柳州，人烟十分稀少。柳州属岭南道，柳宗元上任途中所作〈岭南江行〉出现的“瘴江”、“黄茆”、“象迹”、“射工”（卷 43，1979：1169），都是他沿途所见所闻，记录柳州一带的景况，予人山野荒凉险恶之感。柳州的峻岭、河川、天气、树林、野兽都入了柳宗元的诗。如〈柳州寄丈人周韶州〉中“越绝孤城千万峰（卷 42，1979：1165）”句，指柳州在越之绝境，群山连绵不绝。又如〈寄韦珩〉中“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卷 42，1979：1142）”句，把柳州茂密山林中的大树与野藤遮蔽天日的阴森之感，还有悬挂纠缠在树梢的毒蛇等可怖景象入诗。

而柳州的森林温热，瘴疠之气常弥漫，在柳宗元多篇诗文中都可见其形如瘴气严重的情景。柳宗元以“桂岭瘴来云似墨（卷 42，1979：1173）”来形容瘴气来袭的天昏地暗，而人若不甚吸入便会生病。相邻的两处山水景色也成为柳宗元笔下的主角，如〈柳州寄京中亲故〉中“林邑山联瘴海秋，牂牁河水郡前流。

（卷 42，1979：1185）”及〈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中“林邑东回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汤。（卷 42，1979：1167）”。前者再度将瘴气入诗，显见柳州山林确实瘴气围绕，且浓重得形同雾海的程度。后者描绘了位于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区的柳州，山峰如利戟，而河水沸热如汤，是用夸张手法形容柳州的炎热。虽是夸张之词，却也传达出柳州酷暑难当的天气。而〈雷塘祷雨文〉描述柳宗元依当地风

俗到雷塘祈雨，透露当地时有干旱的情况。如此，柳州炎热潮湿的气候，古老山林中的稀奇虫兽等都是柳宗元上任后得面对的自然环境挑战。

柳州的文化与民情，又与汉人风俗文化有所不同。事实上，与永州同是“百越文身地（柳宗元，卷 42，1979：1165）”的柳州更加不开化。〈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云：“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柳宗元，卷 5，1979：124-125）”柳州为南越之地，跟永州人民一样，不仅身上皮肤有纹身，也作“椎髻”的打扮，又以葛草制成服装，十分有别于中原人。且当地人性情好勇斗狠，连古代圣王之仁爱 and 秦朝军队的骁勇都没法化育他们，可见他们是好勇斗狠，文明教育相当落后的民族。元和十年冬，柳宗元写于柳州的一首七律〈柳州峒氓〉，对当地少数民族独特的风土人情有生动的描写：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

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

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卷 42，1979：1169-1170）

诗中提及柳州城人民的日常生活习俗，异族穿着，还有宗教信仰。柳州人民尚鸡骨占卜，即以竹签插入小公鸡的胫骨，以此预测一年的收成好坏、办事的吉凶祸福等。冬天时，以兽毛制成的寒衣御寒。他们连嘴里说的语言都跟汉人不一样，要与他们沟通还得通过人员翻译。语言不通导致办理公案时不能

利索行事，需要反复询问，过程繁杂耗时，这无疑形成了柳宗元治柳的阻力，令他有异域文化不可亲之感。

此外，柳州居民们也面对干旱和取水困难的问题。据〈井铭并序〉描述，柳州人民“以罍瓢负江水，莫克井饮。崖岸峻厚，旱则水亦远，人陟降大艰。雨多，涂则滑而颠。（柳宗元，卷 20，1979：554）”长途跋涉取水，过程艰辛。旱天江水低，而柳江岸高，上下来回挑水十分辛苦。若遇上雨天路滑就更加危险了。但州民怨惑讹言，因迷信而不愿掘地挖井，使取水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柳宗元深察柳州人民的迷信之举，为他们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也是柳州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

柳州文化落后，人民穷困，经济上的发展是非常缓慢和低落的。柳州的经济发展驻足不前，追根究底是由于人丁不旺，民间生产力不足，经济活动随之低靡。而人丁不旺的原因除了因为战乱使到人口减少，还包括人口贩卖、奴隶等的问题。这事实上就与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低落有莫大的关系，也与他们的迷信风尚有直接的关联。人民的迷信心态造成“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柳宗元，卷 28，1979：752）”等损害经济效益和发展的问題。

〈柳州复大云寺记〉曰：

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徇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矣”，因不食，蔽面死。（柳宗元，卷 28，1979：752）

这无疑是在崇尚鬼神的迷信活动，不惜滥杀牲畜以期借神力达成愿望，或解决生活中的疑难。柳州原有四座佛寺，三座在柳江北，只有大云寺在柳江南

边。大云寺建竣不久便遭大火，百年来一直没有修复。而沿江南而居的三百户人家，因为失去宗教的精神依托，便寻回巫卜之术、杀生占卜等。他们染上疾病不寻求医方救治，而是请巫师施术。轻则占卜了事，重则以牲畜祭神，视情况的严重性替换成更大的牲畜祭品。若事情或病情始终不见好，就自暴自弃，怨天尤人，完全舍去求生的意志。迷信神鬼让人民无法分辨生命的意义，胡乱杀牲畜，或自我放弃，间接破坏了家庭和谐与生计。想来这样的情况令柳宗元相当头疼，对这群不开化、不受礼教约束的人民，无论是“董之礼”、“束之刑（柳宗元，卷 28，1979：752）”都行不通，十分冥顽不灵。犯了法的会潜逃出去，医药不足也使疾病无法医治而死亡，尤其是孩童与老人，使到户口愈少，垦殖土地的人也愈少，田地益加荒芜，经济随之衰落。

而柳州的人口贩卖问题向来猖獗，而事实上整个南越地区都充斥着大量的人口贩子与案件。柳宗元在永州时期所写的〈童区寄传〉便是描绘了“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卷 17，1979：475）”的人口贩卖情况，甚至有地痞豪强公开强拐幼童的社会现象，而地方官员为了一己之利对这些罪行放任不顾。在柳州，多数地区都还是荒山野岭，不受教育的人民也多，形成盗匪成群匿于丛林，常出没柳州城抢劫杀戮百姓。治安败坏，人心惶惶。柳宗元“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卷 42，1979：1142）”，令他即使彻夜不眠，得忍受饥饿，也要想方设法解决治安的问题。追根究底，是文化教育水平低落已经穷困使到一个人沦为丧心病狂的暴徒。此外，柳宗元还发现当地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那就是穷人向富人借钱，以家中男女作抵押，若无力偿还借债，至利息超过借款时，穷人便沦为奴隶，一生受奴役无法恢复自由。这无疑是变相的人口贩卖，让原本能以劳力偿还的债务，变成廉价的终身奴隶。对与唐代的奴隶现

象，孙昌武先生表示：“这使得许多破产农民成了奴隶。这也是唐代社会上奴隶不断产生的根源之一。（1998：138）”越多的穷人变为奴隶，使到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生活愈发艰难，生产力随之下降。

因此，柳州对于柳宗元来说充满着各种挑战：恶劣的自然环境、巨大的文化差异、落后的经济与人民教育，还有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以及医药的匮乏，都构成了治理柳州的重重障碍与困难。

但是，除了这些柳州本身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构成的治理困难，还是属于外在而已，柳宗元本身尚有内在的三痛，影响着他的心神：至亲生离死别之痛、疾病之痛、贬谪之痛。元和十年七月十七日，柳宗元与其亲友抵达柳州仅二十天，一直追随其左右的堂弟柳宗直病逝了（谢汉强，1999：99）。柳宗元极为悲痛，作〈祭弟宗直文〉哭曰：“一寐不觉，便为古人，茫茫上天，岂知此痛？（卷41，1979：1101）”，并泣誓“死生同归，誓不相弃，庶几有灵，知我哀恳？（卷41，1979：1101）”。柳宗直为人刚健，嫉恶如仇，虽好为文章，且学有所成，却是怀才不遇。他陪伴柳宗元渡过十年的贬谪低潮，竟因刻苦读书成疾，得年三十余岁。柳宗元在〈志从父弟宗直殡〉中发出“呜呼！天实析余之形，残余之生，使是子也能无成！（卷30，1979：323）”的悲鸣，为从弟与自己不得志的一生感伤，更为上天夺取他的性命而痛心。两篇柳宗直的祭文读来字字凄切，令人心生不忍，为之动容。柳宗元在治理柳州初期便经历至亲永别的沉重打击，对他的心理造成难以愈合的创口。

随柳宗元赴任柳州的除了柳宗直，还有其从弟柳宗一。柳宗直元和十年过世后，隔年春夏之际，柳宗一也离开了柳州。〈别舍弟宗一〉表达了柳宗元自己

对这位从弟的思念之情。诗中“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柳宗元，卷42，1979：1173）”句凄惨地带出柳宗元被贬远州十余年来的艰辛，而两位至亲先后与他别离，更使他“零落残魂倍黯然（卷42，1979：1173）”，倍感凄凉。而柳宗直遗孤也交由其照顾，这在另一方面也加重他个人的生计负担，让本就相当贫穷的生活越捉襟见肘。

柳宗元从永州带到柳州的病躯，并无好转。柳州的风土环境相当恶劣，虽自然景色奇丽，却蕴藏许多难以设防的毒虫疫病。这样的生活环境加重了柳宗元的身体负担。长诗《寄韦珩》除了包含柳州的社会状况，也透露柳宗元的身体状况：

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

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

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滯泪盈颠毛。（卷42，1979：1142）

元和十一年，柳宗元先后染上疔疮和霍乱，病魔缠身，浑身疼痛，生命危在旦夕，仍拼命挣扎求生。依据诗中内容，显然他暂时逃过一劫，却已经因生理的病痛，或还包括亲人离世的心理创伤，仅四十四岁便满头白发，筋骨暴露，气息孱弱，形同饱经风霜的老人、行将就木之人。带着弱躯处理繁重的政务，实属艰难。

而贬谪之痛，是从元和元年贬永州开始便不曾卸下的心理负担。在柳州多篇祭文、书信、诗赋，都可见他对自身的谪臣身份耿耿于怀。如元和十三年（吴文治、谢汉强，2004：102）《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中陈述自己受贬罪达十

四年，喟叹“不顾而去与顾而深贖者（卷 34，1979：892）”皆未将他救出苦海，仍然期盼能复起为人。能够稍稍量移北还，几乎是柳宗元半生的呐喊！全篇几近声泪俱下的心绪陈情，令人为之热泪。有关柳宗元的贬谪心态、作品等都已有许多研究，在此便不多赘述。如此，柳宗元的心理层面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抑郁，几乎将其精神耗尽。即便他依旧励精图治，但这个心灵的难关，依旧成为了他的致命伤。以至于他在柳州的文教及经济得到改善之时，便撒手人寰，可知其中的苦难是如何折磨他的身体。

综上所述，柳宗元在永、柳二州遭遇各种来外在的自然环境条件的考验，以及当地风土人情的巨大差异，还得克服自身的健康问题以及悲伤的心理，这些难处都成为治理柳州的障碍。面对重重挑战，柳宗元依然“无忘生人之患”（卷 32，1979：841），矢志为革新柳州社会付出，为当地人民解难。

第二节 治柳之效

与柳宗元私交甚笃的韩愈曾为其撰写〈柳州墓志铭〉，其后三年再作〈柳州罗池庙碑〉。文中对柳州当地的一些民生问题有多方面地述及，柳宗元革新柳州的政绩大抵可以从韩愈的叙述中了解。

于是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园修洁，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先时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

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大修孔子庙，城郭道巷，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柳氏即皆悦喜。（1996：2596）

其大意不出柳州人民安居乐业，父母、夫妻、兄弟、子女等都各在其位，遵行儒家礼教美德。出逃的归家了，奴隶恢复自由了，大街小巷美化了，孔庙修复了，全城百姓都十分喜悦。除了兴办教育、绿化城市、解放奴隶，其他的政绩还有破除迷信、掘地造井、传播医药知识等。柳州有如此焕然一新的面貌，皆因“柳侯为州，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三年，民各自矜奋……（韩愈，1996：2596）”。这是柳宗元与柳州民共同建立的柳州，但柳宗元为妥善治理地方的真知灼见和精诚之志更是不容忽视的。总括而言，柳宗元之于柳州的贡献包括推广汉人文化、普及人民教育、促进经济发展、开发与绿化土地环境、传播医药知识、打击罪案等。而本节将集中讨论把柳宗元于文化教育、经济与社会发展上的政绩带来的正面影响。

自唐太宗以“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司马光，卷193，1092/1956：6085）”之法治国以来，“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柳宗元，卷5，1979：124）”的理想便开始逐步实现。柳州南夷之地，烧杀掳掠的罪行日夜可闻，柳宗元初到柳州数日便亲耳听见这些令人发指的行径，使他夜不能寐。如此无法度之境，加强法律并非最见效方式，柳宗元认为兴文教是当务之急。为此他兴修孔庙，作〈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据碑文记录：“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柳宗元，卷5，1979：125）”此文应作于元和十年十月之后，即柳宗元到任柳州仅三月余，而八月左右他已着人修复孔庙。他慨叹一直以来人们孔子要来到九夷居住，人们觉得困惑。而如今他柳宗元来到了南夷

之地，他体会到孔子的用心。而柳宗元本身也实现了孔子之愿，在柳州传播儒家的教育，惠化万民。柳宗元进而发出了祝愿，希望“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又况巍然炳然，临而炙之乎。（卷 5，1979：125）”人民的思想与品行，能受孔子之教熏陶，成为孝义双全的忠礼之人，让社会文化能有所更新与进化。

化育柳州民的第二步是统和儒释，即以儒释之道相辅相成，让宗教和思想知识成为他治柳柳州的教化工具。柳宗元将儒家思想植于柳州之后，为了更有效解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的问题，他认为“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宗元，卷 28，1979：752）”既然当地人迷信神鬼，用孔子的礼法约束他们不足以改善他们弊端，那便借“佛”来抗衡神鬼。所谓“大云寺”便是佛教寺庙，乃武则天称帝时，亲自下令颁布《大云经》并令各州都建造大云寺（司马光，卷 204，1092/1956：6469）。而《柳州复大云寺记》记载：“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隐远而取其地。……后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复就。（柳宗元，卷 28，1979：753）”显然柳宗元在兴复孔庙之时，也筹划大云寺的修建。而早在元和十年，柳宗元上任时便将当地人的“神”驱逐到别处，以方便他管理地方的宗教信仰，停止那些怪力乱神的巫卜。此处也可看出柳宗元的远见，将佛法融合儒学，让宗教与哲学思想在未开化的柳州民的观念中产生作用。

大云寺的修建耗时两年，但随其建竣带来整体成效是显著的。柳宗元主张将小僧舍扩大成寺庙，取其旧名“大云寺”，让寺内建有东西厢房和一些设施，可以供读书人居住。而大云寺最重要的功能还是让僧侣们传播佛教教义：

会其徒而委之以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告焉而顺之，庶乎教夷之宜也。（柳宗元，卷 28，1979：753）

僧侣们每日诵经念佛，传扬佛法，使柳民开始放弃迷信神鬼而轻易杀生，转而投向讲求仁爱的行为举止。柳宗元有意以佛法经义，包括不杀生等戒律，将柳民所崇之神替换为佛。当地人深植心中的神，是他们日常生活里的精神依托，由于传教人的误导而将信仰之心导入歧途。若能将教义妥善发挥和宣导，不失为一个教育众人的管道。韩愈指他“因其土俗，为设教禁（1996：2392）”，这与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中“因俗以成化”（卷 27，1979：733）的想法契合。柳宗元所施的以教易教的方法，不只是因地制宜的措施，也是以人民故俗为基，逐渐以其他的教义取而代之。如此的改革方式是温和的，也让思维观念较为闭塞的柳州人民能够轻易受用，进而达到潜移默化之效。最终柳州造就了“老少相教语，莫违侯令”、“莫不付度而后事（韩愈，1996：2596）”的风气，柳宗元的教化成效是显著的。

历代对柳宗元兴文教之功多是异口同声。归有光〈寿柳州计先生序〉云：“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显，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2005：207）”。清乾隆帝亦对他赞誉有加：“柳子厚开此邦之文教”、“左迁而能化民成俗者，莫如韩柳……柳侯刺柳州不鄙夸其民，以身示教，柳人知学自此始（乾隆，1764/1959：11、190）”。柳州的文化教育从柳宗元上任以后，开始往正确的方向振兴起来。当时，“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著述之盛，名动于时。（欧阳修、宋祁，卷 168，1060/1975：5142）”柳宗元的文明与官名远扬全国，各地学子宁愿千山万水来拜师。而他在柳州兴文教的

绩效，并不停留于那四年的任期。从柳州的府学推进，到明代有了县学；宋代开始又有驾鹤书院，明代有同仁书院，及至清代有柳江书院，由柳宗元兴办文教让柳州文化得以发展，并获得“岭南文化之邦”的称誉（程朗，2005：129）。如此，柳州的文化事业，以柳宗元任刺史为发端，逐步迈向辉煌。

而经济方面的政绩，柳宗元主要是往提升人民的生产力及开发荒地方面着力。而其中最为重大的政治改革，便是解放奴婢。然而，关于这些改革柳宗元并未留下亲自撰叙的诗文（谢汉强：1999：7）。六朝以来，岭南地区长期保留了部族制及奴隶制。这样的特殊社会制度使到岭南一代的社会结构扭曲，奴婢数量庞大，公开掠卖奴婢的风俗大行其道（王承文，2005：39-40）。前文提及，在柳州的旧俗中，“民贫以男女相质，久不得赎，尽没为隶。我侯之至，按国之故，以佣除本，悉夺归之。（韩愈，1996：2596）”此处说柳宗元是按照国家固有的法律来操办奴隶贩卖的问题。事实上，朝廷确实设有禁止买卖奴隶的法令制度，却是“虽量轻重，各正刑典，犹虑未降明敕，尚有因循”（董诰等，卷60，1814/1983：645）。奴隶制度的残余在落后的福建、黔中等地区尚未能消除，因此柳宗元设法将此俗汰换。“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韩愈，1996：2392）。”他让已没为奴隶的男女记下工资数额，到了工资的数额足以抵消借款本息时，便当作债务已清偿，而债权人必须将他们都释放回家。“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韩愈，1996：2392）”。如此一来，许多的奴隶都回复原籍。人民生产力恢复，经济便能得到提升。〈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更记载了“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诸君州事，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柳宗元，卷27，1979：726）”，可见柳宗元治理地方户口问题效果显著，贤能官员都效仿之。

其次，柳宗元为建设柳州，亲身下野拓荒，在柳州发展农业、造林、畜牧业，以及生产技术。栽植果林树木不仅让柳州物资更加丰富，连带城市土地也有更多的开放，也有美化及绿化城市的效果。

当初被贬为柳州刺史，朝廷多少有点嘲讽之意，对此柳宗元深知其意，反而借题发挥，作〈种柳戏题〉。诗曰：“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柳宗元，卷 42，1979：1971-1972）”此为柳宗元于元和十一年（816）参与柳州城市绿化活动时所兴，他将惠民之根借柳树植于柳州之土，希冀未来若人民能见树思人，那便是他留下惠政的缘故了。同年他也作〈井铭并序〉，讲述柳州民取水艰难，柳宗元下令民众凿井，请来和尚谈康及牙将米景勘测井位，见“其土坚埤”，料想“其利悠久”（卷 20，1979：554）。这是柳宗元的愿景，愿所有利民的建设都能长远保持。正如文末所说：“盈以其神，其来不穷，惠我后之人。噫！畴肯似于政，其来日新。（柳宗元，卷 20，1979：555）”他把愿景进一步扩大，希望后人能继承他的志业，长远地造福柳州这个落后的地方，让柳州更加进步和繁荣。

其他如在修复大云寺的同时，“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滕。（柳宗元，卷 28，1979：753）”顺带建设了一些有益于社会发展的房舍、空地、垦殖地，并栽种树木及竹林，让人民能够自食其力、自供自给之际，也能享受到居所改善和环境美化带来的好处。又如〈柳州城西北隅种柑树〉描写他参与种植二百株柑树的事迹。这些柑树种于柳州城西北的荒地，在春天的时候便长得十分茂密，一片绿意。

柳宗元“手种黄甘”，“坐待成林日（卷 42，1979：1182）”是他对柳州未来发展的热情想象。他也在〈柳州东亭记〉记述于柳州南城门外一处“草木猥奥，有崖谷，倾亚缺圯（柳宗元，卷 29，1979：774）”的废地，原有猪只、蛇群在这里聚集，他命人把杂草杂木砍掉和清理干净，再“树以竹箭松桎桂桧柏杉（卷 29，1979：774）”等绿园佳树，并建造可瞭望和休憩的亭堂，命为东亭。

柳州的人文素养提升，柳宗元不忘加强社区刑法以保治安。〈答刘连州邦字〉“负弩啼寒狄，鸣柝惊夜獠。（卷 43，1979：1168）”句，是柳宗元借司马相如到蜀地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时，地方县令“负弩”相迎并为其作开路先锋的典故（司马迁，卷 117，1959：3047），表达自己有志为柳州的发展尽心竭力，并为保护社区治安，亲自巡夜打更，漏夜开堂审讯、缉拿罪犯。于是乎，柳州的原来险恶的环境也得到改善和美化，并更适合人民居住及维持健康安宁的生活。而柳州人民爱戴柳宗元之情，有诗可观：“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馆依然在，千株柳拂天。（刘斧，卷 1，1983：10）”何书置先生指出此诗乃是民歌，且是罗池庙建竣之后（1994：279），可见柳宗元的刺史魅力源远流长。

韩愈在〈柳州罗池庙碑〉中描绘了一个百废俱兴的柳州，人民恪守礼义，全家和谐团聚，这是柳宗元施行教化奏效的缘故。而因为贫穷而被迫为奴的各家庭子女能赎回己身，这是柳宗元制定了利民的法令。兴修孔庙，让圣人之道能传播于柳州各地，以及绿化城市的活动，也都是柳宗元的惠政。柳宗元于柳州各方面的繁荣进步，功不可没。他精诚竭力地为民服务，亲力亲为，将自身以民为本的重要态度实践开来。在永州他不能办的，也办不到的，到了柳州他尽其所能去成就。即便当时的他还遭遇至亲宗直、宗一的生离死别的痛楚，还夹带

“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柳宗元，卷 42，1979：1142）的恶劣环境侵害其身体，可柳宗元治柳的决心与毅力从他未至柳州到执政之初，都是从一而终。柳宗元以一州之长的身份化育柳州子民，深得民众景仰与爱戴。

第四章 柳州革新与“顺宗新政”之政治思想流变

本章将讨论从“顺宗新政”到治理柳州之间，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的变迁。第一节将概述“顺宗新政”时期的各大政改，并着重柳宗元所参与的行政事项，将其用于施政的政略作进一步的探究。第二节将统和两个时段的政治活动内容，探讨两者的相异与相似之处，深入研究柳宗元沉潜永州十年之后的政治革新思想之流变。

第一节 柳宗元“顺宗新政”的政略要旨

经历安史之乱的唐朝已不复盛唐气象，走入中衰的时代。但有一批人未向历史和政权的趋势低头，他们毅然地站上执政的高台，企图改革朝纲，整肃朝廷颓败的政治歪风。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以王叔文为首的政治集团，辅佐早已中风失语的李诵继位为唐顺宗，掀开“顺宗新政”帷幕。该革新集团以王叔文、王伾为首，余下成员有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吕温、李景俭、凌准、陆质、韩泰、韩晔、陈谏及程异。

这一次的政治改革行动，在中唐朝野掀起了滔天巨浪。外有藩镇节度使对内政虎视眈眈，内有宦官集团与朝廷重臣里应外合，两边的人马都反对政治上的革新。王叔文集团内部亦因为顺宗疲弱，韦执谊持中立态度等，内忧外患，最终导致革新行动在同年八月夭折。此后，王叔文政治集团全体遭罪外放，或

监禁或贬谪，史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其中吕温在“顺宗新政”期间出使吐蕃，李景俭丁忧，而陆质在宪宗登极之时正病危，因此都不在“二王八司马”之列。

“顺宗新政”的成员抱着兴利除弊的革新目标，而他们的政治策略之理论基础应为新《春秋》学思想。王叔文集团成员都倾心于陆质的《春秋》学，对于他的思想理论有多方面的研习。包括柳宗元在内，吕温、凌准、韩泰、韩晔等人都是陆质的弟子，章士钊先生指出：“陆淳并非子厚一人之师，而实是八司马及同时辈流之所共事。（2000：217）”因此“顺宗新政”时期的整体的政治倾向和政略可以说大部分受陆质的影响。

据《资治通鉴·唐纪·永贞元年》记载，王叔文集团的理政的管道并不符合规制：

叔文至翰林，而任入至栢林院，见李忠言、牛昭容计事。大抵叔文依任，任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转相交结。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后宣于中书，韦执谊承而行之。外党则韩泰、柳宗元等主采听外事，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倜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司马光，卷 236，1092/1956：7609-7610）

上文显示了“顺宗新政”的行政管理过程波折，通过宦官、宠妃相互转达御令和朝政，而无经过任何官方正式管道。而他们也因为在短时间内登上执政之位而有轻浮的议论，并未能透视名利之位是否摇摇欲坠。而柳宗元的骨干地位在此处也有所凸显。柳宗元被贬之前的官职为礼部员外郎，执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令。虽不是什么高位，却也是“二王”荐举的。〈上河阳乌尚书启〉中提

到，柳宗元“以文字进身（卷 36，1979：929）”，因此其在王叔文政治革新集团中所扮演之角色可以推测是负责起草诏命制造的人，而这些草诏在当时王叔文集团与朝中政治势力的角力中起着关键作用，与政令、人事等重要决策有莫大的利害关系（孙昌武，1998：74）。柳宗元自己也表示“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柳宗元，卷 30，1979：780）”，想来他在“顺宗新政”时期中的职责与当时大小的政改都有涉及，自知当属八司马中罪状最重者。

王叔文等人有意要拔除藩镇，但短期内却不能成行。一方面对藩镇派使臣欲以金帛结纳之事予以严辞拒绝，王叔文更怒极欲杀鸡儆猴；一方面却又无可奈何需对藩镇节度使予安抚动作，避免叛乱骤生。因此“顺宗”的改革仅止于朝廷内部，国内的藩镇势力未能触及。碍于各种历史因素又或者当时环境的不允许，从柳宗元的诗文作品以及史书的记载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哪项政绩属柳宗元倡议或执行。既然柳宗元是“二王、刘、柳”中的其中一位骨干，想来柳宗元与“顺宗新政”时期的革新政策都有直接关联。“顺宗新政”启动半年里，便办了不少政务，主要为打击弄权干政的宦官、停罢“宫市”、“五坊小儿”；打击贪污官吏，纳用贤臣；免除一批苛捐重税，减缓人民负担、出宫人及裁减冗员。

甲子，上御丹凤门，赦天下，诸色逋负，一切蠲免，常贡之外，悉罢进奉。

贞元之末政事为人患者，宫市、五坊小儿之类，悉罢之。（司马光，卷 236，1092/1956：7610）

顺宗正月末登基，二月便颁布诏令，大赦天下之余，亦将前朝为患已久的陋政一举革除。如“宫市”，名义上是为皇宫采买日用品，负责采办的宦官滥权，

以强行攫夺的方式或以低于成本之价向人民购买货品，令做小买卖的人民血本无归。而“五坊”乃指雕坊、鹞坊、鹰坊、鹞坊、狗坊，为唐代宫中饲养猛禽猎犬以备皇帝打猎之用的部门，各坊供职者则称作“五坊小儿”。“贞元末，五坊小儿张捕鸟雀於闾里，皆为暴横，以取钱物（韩愈，1996：2841）”。此二者为德宗晚年两项最大弊政，皆由宦官执行，早在顺宗即位之前便有耳闻，可见其猖獗程度。

唐德宗重用宦官，疑文臣，导致宦官的势力在后宫坐大。“德宗对宦官信任与听从超过了任何朝臣和地方官，以致于帝王宰相之命操纵其手（胡可先，2000：104）”正因如此，宫市、五坊小儿等宫廷旧制才会在德宗的放任之下愈见嚣张。王叔文集团针对宦官权重的问题，在执政后便急于操办。除了罢停宫市、五坊小儿等低层宦官的滥权行为，也或减或停宦官的俸钱。《册府元龟·邦计部·俸钱》：“唐顺宗以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百官及城诸使，息力本钱，征放多年，积成深弊，内外官料钱职田等，厚簿不均，两税及诸色摧税钱物重轻，须有损并，宜委中书门下与所司商量其利害条件以闻，不得擅有闭余，禁钱务，令通济。又诏停内侍郭忠政等十九人正员官俸钱。（王钦若等，卷 507，1013/1996：5766）”这是中唐以来前所未有的政策，是王叔文集团打击宦官集团的第一步。可惜的是，这样的政策却没有办法持续施行，而唐代也在宦官在幕后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步向灭亡。

此外，在税收方面，顺宗下令除正税之外，禁断诸色榷税。“诏二十一年十月已前百姓所欠诸色课利、租赋、钱帛共五十二万六千八百四十一贯、石、匹、束，并宜除免（刘昫等，卷 14，945/1975：408）”将人民积欠的税赋取消，减

缓其经济负担。二月二十五日，顺宗停罢盐铁使的“羨语”、“月进”等官员敛财进献以求恩泽的陋习（韩愈，1996：2842）。这些进献可为钱财或稀奇珍玩，官员为了讨好皇帝，以搜刮民脂民膏来筹集贡钱。长此以往，劳民伤财。顺宗上位后便将这些苛捐杂税一律停罢。

类似的裁退冗员如“出宫人”也在三月时段颁行。“三月庚午朔，出后宫三百人。”、“癸酉，出后宫并教坊女妓六百人，听其亲戚迎于九仙门。百姓相聚，欢呼大喜。（韩愈，1996：2842、2843）”减少宫人数量，将不适用的闲杂人等驱出宫外，不单减轻宫中俸钱支出，百姓对此政策亦表乐意。

“顺宗新政”也对朝臣官吏做了不小的调整。除了兵权未能成功夺回，王叔文集团痛击贪鄙之徒，将贪官李实罢黜，大快人心。李实自贞元十九年起担任京兆尹，以皇族身份暴虐百姓，为人刻薄，大肆聚敛百姓之财，“京师无不切齿以怒实（刘昫等，卷 135，945/1975：3731）”。除此之外，王叔文集团更积极招揽贤才，入将贤名远扬却被贬远州的陆贽及阳城请回。两人却未接诏便去世，谓为憾事。

由于新政仅维持半年，且是在风风火火、诸多流言蜚语的情况下开始和结束。又碍于王叔文集团曾极力阻止唐宪宗封太子，因此新政内容和诏书等资料多已淹没，甚至遭到篡改，如韩愈《顺宗实录》虽称“实录”却非信史。

然若观照柳宗元未投入新政之前，其政治思想已在文字中有多方面的呈现。而这些文章也与“顺宗新政”期间的政略倾向契合。如〈晋文公问守原议〉便是针对宦官干政发出批判之声；〈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就表达了对阳城及太学生的直言敢谏、为师请愿的行为的激赏，表现其爱贤惜才的思

想。而如<梓人传>以故事形式表达为相之道、养人之法，意在突出他对官吏由上至下的管理之重要性，还有官员执行政令的角色的一些看法。在<种树郭橐驼传>中也传达“顺木之天，以致起性（柳宗元，卷 17，1979：473）”的概念。这些文章不仅凸显了柳宗元在政治上的谋略，事实上在“顺宗新政”中，举贤能、除奸臣等兴利除弊的举措都按照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

虽然新政来不及处理藩镇问题，但柳宗元在<铜叶封地辩>、<封建论>便提出了对分封制度的看法，批评藩镇节度使的巨大社会问题，表达自己反对割据势力，支持皇权和郡县制。而<时令论>上下、<断刑论>亦是他政治革新理念之精粹，其中包含了“大中”思想，折射出革新政治的远大精神。

以上各篇文章作于贞元十五年至贞元二十一年，是他担任集贤殿正字至礼部员外郎之间所作之文。他对治国与为政之道，富有创见，且能滔滔雄辩，名振当时的文人界，打响了知名度。这也成为了他加入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契机，让年青的革新抱负转化为惠民政略，施于朝廷及民间。

第二节 治柳与“顺宗新政”的异同与流变

如前文所述，在柳宗元短暂和断裂的政治生涯中，有过两次积极且重要的政治表现，即“顺宗新政”及柳州革新。这两项政治行动都属于政治改革，在柳宗元的青壮和中年两个时期发生，并产生了两个极端的结果。“顺宗新政”的结局是悲惨的，他为柳宗元带来了十年的穷荒贬谪。但柳宗元曾经有机会回

到朝中任职，却因为种种原因还是被谴回了远地。随之而来的柳州之治，柳宗元亦是抱着由喜转悲的一种心境赴任。读柳宗元的一生，是一部不得志的悲史。但前后两次的政治革新行动，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柳宗元的志向能有所发挥，虽然两厢的结局不尽如人意。本章便是探讨两者间的异同以及流变，观照其政治革新思想的发展。

首先，两项革新中，柳宗元的身份和职务是不同的。在“顺宗新政”里头，柳宗元负责议事和文书工作，主要的决策人似乎还是王叔文。他在王叔文集团中也扮演活招牌的角色，借其文名吸引文士向他们靠拢。但无论如何，他以礼部员外郎身处朝廷内部，在当时又与理政的王叔文有直接的关联，以当时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立于权位的顶峰随时平步青云，是少数把握政权的朝臣之一。而柳宗元走马上任柳州刺史，美其名是任命，表面上品位也升了好几级，但柳州地处南夷，远离长安，比之永州是更为荒远的。而“刺史”一职，在唐五代来说，都是由“不才、获罪之人，郡佐、幕士之色”（尚永亮，2007：15）来担任。可无论如何，柳州属下州，柳州刺史乃正四品下的方面大员，是地方最高行政官员。柳宗元在柳州执掌一方土地，可以凭己意决断州事，也可将政治理念具体实践于柳州民间。这与仅是作为短命的“顺宗新政”中的一员有较开阔的执政平台。

再来，柳宗元实行革新的地区与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所面对的困境也大不相同。长安是首都，为全国最发达之地，四方人才皆聚集于此。无论是人民的文化素养、社会物资以及各方面知识都比其他地方来得充实和丰富。而柳州属南夷，在当时而言与荒山野岭无二致。且人民又是少数民族，其文化无非部

落、神鬼为主，无先进的生活观念和知识。对于一个在长安生长，接受圣人思想教育柳宗元，要管理文明意识如此落后的地区，必然面对不少挑战。事实上，柳宗元的生理便不能适应当地环境。而语言不通也阻碍其管治柳州。在“顺宗新政”时，他要面对的是专宠多年的宦官集团和位高权重的朝臣，这些人莫不是满腹经纶、习于权谋之术，加上根深蒂固的政治势力，加剧他与整个革新集团推行政改的困难。因此，虽身处政权中心，却是岌岌可危，亦没有决策权。

长安与柳州的经济体系和社会建设也有着天壤之别。柳州自秦代开发岭南以来，至汉元鼎平南越之后，皆“以其故俗治（司马迁，？/1959，卷30：1440）”，并未将中原儒教文化思想传入南夷之邦，反而是让当地人继续奉行固有习俗。正因如此，柳州百姓的文化思想都极为封闭，长期迷信鸡卜巫师，致使人丁寥落，经济自然一蹶不振，整片土地也难以迅速发展。而长安虽是国都市民却常年受到“宫市”等宦官滥权滋扰生息，人民的生计基础遭破坏。可柳州相对而言的在各方面都落后许多，各种社会建设都不足，其中包括房舍、耕地、学校等。“顺宗新政”的展开是缘于朝廷弊政祸害百姓，是时代所趋的必然之事。而柳州若没有在元和十一年迎来一位柳宗元，也许当地文教事业的起飞还得往后推延。同为改革，但两地所需的改革不可能完全一致。

尽管如此，据戴义开先生的说法，柳宗元治柳的政治革新思想是延续了“顺宗新政”时期的精神（1993：149）。两项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政治改革，在诸多的差异中也存在其共通之处。而将两项革新联系起来的，关键还在于是柳宗

元个人的政治革新思想，以及其改革的实际作为。大而化之的说，共同点便是柳宗元一以贯之的民本思想。

述及“顺宗新政”期间执行的各项政策，如提升人民的经济条件，即取消欠税和减免杂税，停罢前朝弊政如官员进献、宫市等。而柳州方面，虽无任何柳宗元有关税赋的政策史料，却能得见柳宗元为推动柳州经济发展，解放奴婢、开发土地、兴建设施，以方便人民发展生计，此谓富民之政、利民之举。而兴办教育的政策是柳州发展中最为宏大、影响最为深远的一项革新，可对于“顺宗新政”文化教育的改革并不是重要课题。“顺宗新政”的主要革新对象和政敌是宦官集团。但不可忘却的是，革新政治，终归是再造社会的行动，旨在革除陋政、发展新律，以安邦利民。无论是在“顺宗新政”抑或柳州革新，前者是要除去宦官集团、藩镇割据带来的政治危机，而后者是汰换旧制，使地方能在施行崭新的政略和政令之下，在各方面有明朗的发展。而柳宗元在两项革新中都贯注了他的民本思想。

柳宗元的民本思想，启发自儒家观念中的“仁爱”。章士钊先生对柳宗元有此评价：“子厚之优异者，在主张民为至上，凡事之病于民，或与民无涉者，皆当毁弃。”（章士钊，2000：1003）这是对柳宗元“以生人为主”的思想的一个赞扬，并指出柳宗元极为重视生人之利。他的终生志愿无非“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柳宗元，卷32，1979：841）”。这段信誓旦旦的话语将其核心政治革新思想——“大中”观念及儒家积极入世之精神表露无遗。

不可不提的是，唐代士人向来“重内轻外”，认为在外州任官不如在朝中任职能接近中央执政，商议天下大事；以为刺史者，并不在理政的位置上，也不能有什么作为。《论语·泰伯》也有谈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朱熹，卷4，1174/2012：106）”但柳宗元却表示“岂不可为政也？”。以唐代士人的眼界而言，柳宗元可谓是突破士人团体的观念局限。柳宗元自知他在柳州是“怀印曳绂，有社有人（卷1，1979：1）”。尽管这似乎不比御前侍驾，于朝堂议论天下政治机要来得“出人头地”，却是能为民服务的绝佳机会。况且，他从不自斥，在永州期间潜心作文治论，正如他在贞元末年时那般耕耘文字，仅为述己政见与谋略，以期用于日后。

柳宗元之所以能突破当代士人“重内轻外”的为官想法，可从他的民本思想中推敲出来。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中有“吏为民役”的观念。所谓“生人”、“人”、“民”、“生民”、“元元”等，在柳宗元的著作中经常出现，而这些名词都含有人民、众人之意（郭少明、周桂钿，1993：23）。最著名的说法是“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柳宗元，卷23，1979：616），提出官吏者应是为人民所役，而非劳役人民。此论调颠覆自古以来官役民的常观，是柳宗元透视“以民为本”的本质的表现。如柳宗元重视柳州的社会治安，在公庭上行职官之责，为人民解决纠纷问题，对柳宗元来说是何其重要！由于语言不通而拖延案件的调查与审理，以至于有了“欲投章甫作文身”的感慨，无疑是柳宗元充满热忱与诚意的真心告白。柳宗元抱持“有补于万民之苦（卷30，1979：788）”的民本思想，是“大中”思想的体现。

柳宗元是继承儒家思想的，但他也习于先秦诸子百家的学说，并涉猎于儒、释、道思想，且有融合三者的迹象。这不止在其文章能反映出来，其柳州的政绩也呈现出他确实融汇各家学说之善来治理地方，如建庙立寺、祭拜神佛的同时，推广儒学道德价值观。但柳宗元实则反对有神论、天命观，并且是一名积极的无神论者（苏培干，1993：207）”。如此一来柳宗元的思想似乎出现了一个矛盾，连带他的革新思想的基础也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出现“柳子至此，信奉佛氏似少衰矣，盖读书久而少有悟也。（何焯，卷36，1987：645）”这般的误解。然而，柳宗元是“无神论”与否，与统和儒释等涉及宗教的行为是没有冲突的。原因是除了儒家正统的思想基础之外，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之启蒙源之于“新《春秋》学”的“大中”思想。

从早期的“顺宗新政”到后期的柳州革新，二十余年来贯穿其政治革新思想的红线是“大中”思想（戴义开，1993：160）。在“顺宗新政”及柳州革新新活动中，柳宗元都广泛地应用“大中”思想理论，并有所实践。而柳宗元曾经提出的“大中之道”的思想包括：

要归之大中而已。（卷4，1979：106）

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卷3，1979：89）

当也者，大中之道也。（卷3，1979：91）

不难发现“大中”思想与圣人思想是相关的。所谓“大中”，并非具有调和、妥协等特点的中庸之道（高海夫，1985：28）。柳宗元将儒家经典中的“圣人之道”的达成关键设定为“立大中”、“归之大中”，一切的治国理念都围绕着“大中”思想。为进一步解释“大中”思想的立论，柳宗元提出“经非权则

泥，权非经则悖（柳宗元，卷 3，1979：91）”的情况。“经、权、当”有相互前后关系。经，指常规、定理；权，指运用常规的手段方法。然而经、权都是“强名”而已，“离而为名者”只会沦为“大中之器”，而不能成就“大中之道”。此为柳宗元对墨守成规、拘泥于形式者的批评。两者若互相违背或少其一，便会拘泥于手段不知变通，又或者背离真理而大谬。两者是互补共存的，缺一不可。最好的结果是将经运用得宜，也就体现了“大中之道”。

“大中”思想具有积极的革新意识，不拘泥礼教、不悖逆真理，并且要融会贯通，将真理灵活运用于理政。“大中之道”的评审标准还在于得“当”与否，此处凸显了柳宗元考虑现实，重视实际成效的心性。那些“不当于理、当于事、当于‘生人之意’（高海夫，1985：3）”的论说都属“大惑”，柳宗元不以为之“圣人之道”。他为“圣人之道”加上了新的注解与诠释。诚然，柳宗元继承了陆质之学，儒家思想都为之所用，加以改造，构建新意义，以便服务于自己的政治革新思想。所谓“大中”也就是取其中也者，此“中”便是柳宗元自身的理想。若此“中”置于他人的思想，又会成为他人之“中”。但总的来说，“大中”的理论不变，变的是“中”的实践，是因人而异的。

历代有关柳宗元的言论中，苏轼曾提出柳宗元的学说大致可定位为“以礼乐为虚器，以天人不相知。（续集卷 5，1964：157）”。苏轼并不推崇柳宗元，并有诋毁之语。他如此笼统的概括，却也切中了柳宗元的思想逻辑。但柳宗元并未去到将礼乐完全忽略的境界，抑或抱持彻底的天人相分思想。而苏轼之所以作此结论，在于柳宗元入仕之初曾写《蜡说》、永州有《非国语》等篇，对礼乐制度表达其独特的见解。其看法不外乎针对一些已存的礼俗仪式如蜡祭飨神、

藉田三推之礼，乐礼对政令传播的作用等。柳宗元认为祭神的礼节都是表面功夫，是流于形式而没有实际的惠民作用。他说“苟明乎教之道，虽去古之数可矣（柳宗元，卷 16，1979：458）”，表达出他重视传统的条例、规制的实际功用，礼乐若能彰明教育之意便可行，可若并不能取得任何长久利民之效，不如将之废除。确实，若能将繁文缛节省去，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人民的精神、钱财负担。

柳宗元青年时便已阐述了礼乐为“虚器”的务实思想。而其思想的出发点，毫无异议地是建立在人民利益考量之上。可能我们又要反驳柳宗元在柳州是借助神佛之力化民的。这在《非国语·神降于莘》中已给予解答：“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柳宗元，卷 44，1979:1272）”对于尧舜之道有所体会的人比之不曾闻道之人，自然要“力足”一些。而柳州人民因为政治制度而不曾接受中原的儒学教育，对于文化与知识的接受度也是参差不齐的。若要育化人民使他们能获利，那就要依他们的能力来施行教育。孔子有“因材施教”的说法，柳宗元则将教育的范围扩大至整个州县。以柳州落后风化的文明程度，柳州民显然需要一个新的规范和楷模来依循及执行，因此要从最基本的知识学起。此时，礼乐在柳宗元眼中便又恢复为一个实用的传统制度。各种宗教礼节、祭拜仪式，柳宗元都一马当先站出来执行，以期上行下效。柳州人民信雷神能降雨，那柳宗元便立马去雷塘祈雨。展现自己入乡随俗的一面之后，便迁走他们原来信奉的神，替换成孔子、弥勒佛的尊像，似乎还担心建寺庙的手段不能见效，遂作祭文、铭文数篇，连凿建水井之后也要有模有样地献上祭文。整体而言，这样的作法有“扶持生产意义”、“以不如是为之，将见神道进一步坠入奇袤。（章士钊，2000：650）”如此教化南夷是较为得宜的，也避免迷

信诸般鬼神的行为带来耗损柳州户数和生计的恶性循环。柳宗元以“因俗以成化”（卷 27，1979：733）之法作为其治理手段，且从一而终，毫不拖怠。如此的治柳之法亦是其革新思想之体现。

王充《论衡·治期》曰：“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2010：361）”的观点。这是一个天命观的延伸说法，认为政治谋略与政策并不是治乱的关键，一切人事都要听天由命。但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是完全背离此说的。〈时令论上〉云：“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柳宗元，卷 3，1979：85）”柳宗元将“圣人之道”与神意天命等划清界限，直截了当地指出能令人事完备妥当的，就是实现了此道的表征。他〈贞符并序〉中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并得出“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柳宗元，卷 1，1979：35、30）”的结论。类似的言论还有“顺人顺道之得天。（柳宗元，卷 3，1979：90）”。如此，柳宗元的政治态度已十分明显。他追求的政治理想是生人得以“利安”，这个理想是与天、与神都无关的。实现此理想就得依循“大中之道”。而“圣人之道”，意指儒家思想，只要“不益于世用（柳宗元，卷 30，1979：788）”那都只是空谈。因此他用自己的文字改造儒学，将“大中”思想立为实现“利安元元”的准绳，顺其理拓展政治革新思想，并实践于治理地方。

若论柳州革新的思想是否得益于“顺宗新政”时期的政治思想，那答案是绝对的。论政思，柳宗元乃至整个王叔文集团都遵从陆质的“大中”之学，“大中”思想又贯穿柳宗元的政治生涯。而最重要的是，柳宗元在“顺宗新政”没法完全实践“大中”思想，但柳州革新时期他将“大中”思想化为现实

政策。“大中”思想得到实践并有惠民善政流传于后，这份民本思想的最终成果是美好的，且是历久弥新的，真正的达成了柳宗元“使其利悠久”的向往。

论政策，新政与治柳在地域、文明水平、施政范围都大不同，自然不会出现政策。但是贯穿其政策的执政理念却无二致，尤其是柳宗元心怀富民、利民之思。在长安有免苛捐杂税的政令，在柳州有提升人民生计的施政，两者都是欲从经济上着眼，以期达到利民、民自利的效果。因此，两个时期的革新政策是异中有同的。

论政绩，顺宗时期的柳宗元欲改革朝政，其政策实施的范围可以是遍布全国的，并且他还要顾虑内忧外患。可同时他也是处在一个政治团体，一个可以聚思广议的政治革新组织。而在柳州他孤身一人为一州办事，却能够取得千古流芳的功业之名。亦不能否认“顺宗新政”和与之相辅相成的新《春秋》学，都富含大胆创新改革意志，打破中唐因安史之乱而变得颓唐不振、驻足不前的政治格局。从时间幅度来看的话，柳州的惠政有更显著、实在、悠久的绩效。

其政治革新思想的流变，通过观照两代的革新行动可得出其中继承、延续的关系，并且在柳宗元的努力和坚持之下，柳州政绩实实在在地有过之而无不及。〈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透露出他倾一生之力，“不以足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宗元，卷 31，1979：824）”的志向。“辅时及物”、“益于世用”、“生人之性得以安”，便是柳宗元政治革新思想的座右铭。

第五章 结语

柳宗元被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缘于他在文学理论与作品方面的超凡成就。相较之下，柳宗元作为政治家或政治人物，不如他作为文学家的地位崇高。历代文士对柳宗元政治思想、态度和活动都攻讦不少，负面的评价比比皆是，如苏轼、宋祁等。而韩愈作为柳宗元的莫逆之交，柳宗元宁舍同为沦落人的刘禹锡而取韩愈，托他为其作墓志铭，韩愈却直指他参与“顺宗新政”是“不自贵重顾藉（韩愈，1996：2391）”之行为。显然韩愈是否定了他早年的政治取向，对于他在“顺宗新政”的政绩也只字不提。然而柳宗元正是因为“冲罗陷阱，不知颠踣。（卷15，1979：433）”，才凸显出他奋勇革新政治的斗志。

柳宗元治理柳州虽仅四年，却获得柳州万民的景仰，甚至因为政绩如此优秀而名流柳州史。柳宗元革新柳州，兴办文教、解放奴婢、绿化城市、建造设施、开垦土地等，为柳州人民带来生活带来进步，不仅经济起飞，人民的文明水平也进化了。柳州民不仅为他立庙、立衣冠冢，也念及他爱柑树在罗池庙建柑香亭、栽柑树。这是人民感念柳宗元的治柳之功的表征。朝代更替，也有帝王知柳州有柳宗元之功，如宋徽宗便追封柳宗元为“柳侯”；乾隆在县志中亦对其直言赞赏。这些明君都晓得柳宗元在柳州施行的善政，影响当地文化教育流传，造就千古事业。柳宗元一生不易其做人原则和思想，他的民本观念引领他加入“顺宗新政”。同样的民本思想，又让他在重返执政之位时，造福柳州。

而柳宗元在青年期间参与的“顺宗新政”，可谓政治改革的一个蓝本，它影响了“甘露之变”的发生和唐代中兴。“顺宗新政”的政治思想之理论基础——新《春秋》学又开启了后代疑古、舍传求经的治学方向，让后人对于创新有了新概念，掀起改革政治情况的思想浪潮。总的来说，“顺宗新政”十分大胆创新，但也是在中唐的大环境下必败无疑的一次政改行动。然而基于王叔文集团成员都有志一同，因此新政时期确实做出了一些具启发性的政绩。诚然“顺宗新政”及王叔文集团在中国历史上常遭非议，但这次改革却也启发了后来无数政客对于政治革新的可行性和成效，报以期许。同是革新，柳宗元在柳州却有了不一样的结果。虽然他无法更长久地为人民服务，施行更多的利民政策，但短短四年的绩效是无可估量的。因此，青年期和中年期的政治思想和行动，便成为了一个可研究的方向。

柳宗元的政思、政策和政绩，是本论文重点探讨的课题。柳宗元的政思是继承了先秦儒家思想，而柳宗元在入仕后则开始接触并继承陆质的新《春秋》学。陆质之学之后也成为王叔文集团实施新政的基础理论，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也因此得到扩充。而柳宗元倡议的政策，或他在柳州施行的政策，都启发自儒家学说以及陆质的核心理论即“大中”思想，形成柳宗元的民本思想。从“顺宗新政”或者更确实的说，是加入革新集团之前，柳宗元早已有革新中唐颓政的抱负。他的这份执念，又带领他渡过十年的孤囚，进而在柳州时能一展所长。柳宗元并没有辜负自己，他苛尽职责、坚守己务，终因操劳过度而病逝于任上，这多么令人惋惜。

不可讳言的是，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却是在柳州得以延续，并更彻底的施行，这与“顺宗新政”时的情况极不相同，并且获得了更为巨大的绩效。柳宗元以民为先的政治革新思想为让在人生中无论高低阶段，都能把握机会实践政治理想，为民造福。从他的政治思想革新的演变中，可以发现柳宗元坚持不懈、一以贯之的精神，正如《大学》中“止于至善（朱熹，2012：3）”且不轻易变更此原则，其政治革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而贯穿其政治革新生涯的基本原则，便是以“大中之道”达到“利安元元”之务。

无论如何，两次政治革新行动为中国政治史写下了不朽的篇章，给历代帝王和官员带来政治思想及政策推行的重大的影响和启发。如“官为民役”是柳宗元官民思想中的一大创见，茅坤认为“昔人多录此文，然其义亦浅。（卷21，1998：1109）”。显然一些学者们对此论不以为然，认为无心为官之人，自然也不会理会这些，将柳宗元的官民论贬为浅俗之说。而清王文濡以此说“为今日公仆确实注脚，势不同而理同（卷21，1998：1110）”，是柳宗元发自内心的劝勉之语，为官吏者应遵循此道。不同时代之人对于柳宗元的官民论产生了不同的接受程度，这应当与当时的社会状态有直接影响。如王文濡处于清末，而同为清代人的张伯行是清朝开国士人。柳宗元的为官思想在他们心中便有了不同的理解和想象。无论何代人对柳宗元的思想有何褒贬，他的官民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影响，甚至是引起争议。因此柳宗元在政治革新中的这一见解确实还需要有更多的探讨。

柳宗元的高尚人格与超越世俗的思想理论，尤其是在为政、为官、为人臣方面，是十分优异的。康熙说他“好贤与善（2005：807）”、乾隆指他“忠厚之

性（2005：234）”。康乾盛世中的两位帝王对他的褒奖，亦不算言过其实。柳宗元不仅惜才爱贤，更以身示教。虽然他参与“顺宗新政”时期，常被攻击为“欲侥幸而速进者（韩愈，1996：2980）”、“不克持身处（吴楚材、吴调侯，卷8，1987：356）”之辈，史书也篡改当时的政绩或歪曲革新集团的政治理念，但是经过“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谬。（柳宗元，卷30，1979：781）”，柳宗元根深蒂固的积极入世之心，不忘立身之志，为民为社，穷心穷力。他对百姓生活贫穷而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如文化落后、疾病丛生、流徙饥民，深知体察。因此而认为富民之政不可少，认为民需自利。有关他在“顺宗新政”的政迹，碍于论文的结构不能详录，也未能做更多的研读考察。然而，柳宗元在当时的政治角色和政治谋略，实际上还需要有更多的挖掘，及更为明确的讨论。

本论文为探讨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之流变，碍于篇幅和时限，并不能将永州时期的政治革新思想纳入，而仅是阐述及讨论将柳宗元早期及晚期生活中的政治实践。因此，未能厘清柳宗元在永州的一个政治革新思想的过渡。这个跨越不止在时间上有十年之久，在地域上亦是千万里路之遥。若有机会能延续柳宗元的研究，必将对他的政治思想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和分析，尽力完善柳宗元的政治革新思想以及他的民本思想。

参考书目

一、专书

1. 白居易（2011），《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2. 董诰等（1814/1983），《全唐文》，2001版，北京：中华书局。
3. 杜方智、林克屏（1994），《柳宗元在永州》，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4. 高海夫（1985），《柳宗元散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5. 葛立方（2003），《韵语阳秋》，永瑛、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479，页79-2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 归有光（2005），《钦定四库全书荟要·震川集》，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韩愈（1996），《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8. 何焯（1987），《义门读书记》（崔高维点校），2006版，北京：中华书局。
9. 何书置（1994），《柳宗元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10. 胡可先（2000），《中唐政治与文学：以永贞革新为研究中心》，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11. 黄永年（1998），《唐代史事考释》，台北：联经出版社。
12. 蹇长春（2000），《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三》，南京：凤凰出版社。
13. 康熙（2005），《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御选古文渊鉴》（徐乾学等编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 李吉甫、贺次君（813/1983），《元和郡县图志》，北京：中华书局。
15. 梁鉴江（1999），《柳宗元传》，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6. 刘斧（1983），《青琐高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刘熙载（1993），《刘熙载集》（刘立人、陈文和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8. 刘昫等（945/1975），《旧唐书》，2002版，北京：中华书局。
19. 柳宗元（1979），《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
20. 柳宗元（2008），《柳河东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1. 陆质（2003），《春秋集传纂例》，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46，页375-53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2. 吕温（2003），《吕衡州集》，永瑢、纪昀等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册1077，页595-67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3. 茅坤（1998），《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柳州文钞》（高海夫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
24. 欧阳修、宋祁（1060/1975），《新唐书》，1997版，北京：中华书局。
25. 皮锡瑞（1954），《经学通论》，2003版，北京：中华书局。
26. 乾隆（1764/1959），《马平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
27. 乾隆（2005），《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御选唐宋文醇》（张照等辑评），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8. 尚永亮（2007），《唐五代逐臣与贬谪文学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9. 沈德潜（1998），《唐宋八家文读本》，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30. 施子愉（1958），《柳宗元年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31. 司马光（1092/1956），《资治通鉴》（胡三省音注），2005年重印版，北京：中华书局。
32. 司马迁（？/1959），《史记》，1982版，北京：中华书局。
33. 苏轼（1964），《苏东坡全集》，2005版，台北：世界书局。
34. 孙昌武（1998），《柳宗元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35. 陶敏、李一飞等（1998），《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傅璇宗主编），沈阳：辽海出版社。

36. 王弼、孔颖达等（1999），《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李学勤主编），北京：北京大学。
37. 王充（2010），《论衡校注》（张宗祥校注；郑绍昌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8. 王钦若等（1013/1996），《册府元龟（校订本）》（周勋初等校订），2006版，南京：凤凰出版社。
39. 吴楚材、吴渊侯（1695/1987），《古文观止》（安平求点校），1996版，北京：中华书局。
40. 吴文治（1964），《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柳宗元卷》，北京：中华书局。
41. 吴文治、谢汉强（2004），《柳宗元大辞典》，合肥：黄山书社。
42. 谢汉强（1999），《柳宗元柳州诗文选读》，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
43. 荀况（1988），《荀子》（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2010版，北京：中华书局。
44. 章士钊（2000），《柳文指要》，上海：文汇出版社。
45. 赵伯雄（2004），《春秋学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46. 朱熹（2012），《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二、论文集论文

1. 程朗（2005），〈柳宗元“兴办文教”与柳州古代文化的发展〉，孙昌武、陈琼光主编，《柳宗元研究文集：第三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研究论文撷英》（121-129），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 戴义开（1993），〈柳宗元治柳思想初探〉，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编，《柳宗元研究文集》（页148-160），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3. 郭绍明、周桂钿（1993），〈柳宗元民论研究〉，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编，《柳宗元研究文集》（页21-34），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4. 苏培干（1993），〈无神论是柳宗元搞政治革新的理论基础〉，柳州市柳宗元学术研究会编，《柳宗元研究文集》（页 203-207），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三、期刊论文

1. 何焜（2002），〈此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柳宗元与永州风俗〉，《柳州师专学报》，2002年12月第17卷第4期，页19-22。
2. 寇养厚（2000），〈中唐新《春秋》学对柳宗元与永贞革新集团的影响〉，《东岳论丛》，2000年1月第21卷第1期，页114-117。
3. 王承文（2005），〈唐朝岭南地区的奴婢问题与社会变迁〉，《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45卷，页39-47。